

商周時期銅鏡的出現與使用

吳曉筠

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

提 要

目前所知中原地區最早的銅鏡集中發現於河南安陽殷墟遺址。它們非安陽地區出產、帶有強烈草原文化特徵等已是學界共識，但其來源為何，迄今仍爭議不休。今日考古發現已累積豐富的材料，亞洲內陸的考古發掘資料及研究也大幅公布、流通。本文由西元前兩千至一千紀考古學文化脈絡出發，回顧過去相關研究、梳理現有考古資料，試圖釐清銅鏡在中原地區的出現、使用及理解，以及本地特色的創製。本文提出銅鏡於晚商、西周時期經由不同的途徑出現於中原地區。銅鏡最終於戰國時期成為中原文化的一種標誌性器物，應被視為認識歐亞銅鏡的性狀、功能後，在本地的工藝傳統中自行創作的一類器物，而非源於歐亞地帶的某處，或承繼商或西周的傳統。

關鍵詞：銅鏡、商、周、天山北路墓地、齊家文化、北方地帶、區域互動

一、前言

目前所知中原地區最早的銅鏡集中發現於河南安陽殷墟遺址。它們非安陽地區出產、帶有強烈草原文化特徵等已是學界共識，但其來源為何，迄今仍爭議不休。如下文所示，目前最廣為接受的觀點或認為發現於甘肅、青海及內蒙古的齊家文化晚期銅鏡是中國最早的銅鏡，或認為新疆天山北路發現的銅鏡才是商周銅鏡的源頭。另一方面，在大量的研究論著及圖錄中，過去關於中國銅鏡的論述，經常將銅鏡自齊家文化及商代晚期出現開始，歷經兩周秦漢，乃至於清代，視為一個延續不斷的傳統。¹ 但若將安陽發現的幾何紋鏡（附錄一：1～6）與西周時期尺寸偏小的素面鏡（附錄一：7～9、19、21、24）相比，如下文所提出的，兩者之間可能沒有承繼發展關係。

今日考古發現已累積豐富的材料，亞洲內陸的考古發掘資料及研究也大幅公布、流通。因此，本文由西元前兩千至一千紀考古學文化脈絡出發，回顧過去相關研究、梳理現有考古資料，試圖釐清銅鏡在中原地區的出現、使用及理解，以及本地特色的創製。

二、發現與研究

（一）早期銅鏡資料的累積與中原銅鏡起源的認識

因銅鏡具有反射、光亮等特性，故而在古代文獻中，經常被認為堪比日月，並賦予神話性格。如此神物的起源，便被比附為遠古黃帝合日月之精華所創造，並為古代皇帝所相信。² 這種認識直到二十世紀初期才有所改變。

二十世紀初，隨著考古學引進中國以及市場對古董需求而來的大量私掘，大量古代青銅鏡出土，其中不乏一些目前所知時代最早的例子。例如瑞典安特生

1 將銅鏡在中國的發展視為由商（甚至更早自甘肅齊家文化或新疆天山北路）開始接續不斷的傳統的觀點，充分反映在大量銅鏡通史性的論著及圖錄中。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如孔祥星、劉一曼，《中國古銅鏡》（臺北：藝術圖書公司，1994）。書中總整古代文獻及考古發現，將中國銅鏡的起源追溯到傳說時代的黃帝時期，時間點與出土銅鏡的齊家文化相近。在論述上，以通史方式陳述。非常接近的編撰方式也見於中國青銅器全集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6·銅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2 （宋）王黼編纂，《重修宣和博古圖》（揚州：廣陵書社，2010），卷28，〈鑑總說〉，頁554-555；（清）梁思正撰，《西清古鑑》（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2），卷39，〈古鑑〉，頁827。

(Johan G. Andersson) 便曾於一九三二年報導一面採集自內蒙古的重圈紋銅鏡(附錄二: 51)。³ 後續於一九七〇年代青海貴南尕馬台銅鏡⁴ 及甘肅廣河齊家坪⁵ 出土的齊家文化銅鏡, 更被確認為中國最早的銅鏡, 起源問題便引起許多學者的興趣。

中國銅鏡起源問題的主要解釋模式可分為中原本土起源與外來說兩種。本土起源的說法多由古文獻及中國青銅器的使用脈絡出發, 認為鏡是由盛水的銅鑑衍生出來,⁶ 由陽燧發展而來,⁷ 或認為是源自多種具有反射效果的金屬器。⁸ 李亨求依據風格分析及當時所知的考古學文化定年, 認為是商人發明銅鏡後北傳至西伯利亞及朝鮮半島。⁹ 但因近年新的考古資料不斷出土, 中國境內及歐亞草原青銅及鐵器時代遺址的科學定年分析有長足的發展, 今日已鮮有學者強調中原本土起源說。早期外來說的主張主要由日本學者提出。自一九三〇年代起, 梅原末治、江上波夫等學者便已討論中原所用銅鏡與歐亞草原文化之間的關係。梅原末治認為是受到斯基泰文化的影響。¹⁰ 江上波夫提出綏遠式青銅器的概念, 並將之與西伯利亞卡拉蘇克文化相連接。¹¹

一九七六年殷墟婦好墓出土了四件幾何紋鏡(附錄一: 1 ~ 4), 其中一面與安特生發現的銅鏡幾乎一致(附錄一: 2), 更為草原說提供堅實的證據。¹² 林沅在論述商文化青銅器與北方地區青銅器關係時指出婦好墓銅鏡與北方系青銅器之間的關係, 極具啟發性。¹³ 但學者通過婦好墓與中國西北及北方地帶出土銅鏡的

3 Johan Gunnar Andersson, "Selected Ordos Bronze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5 (1933): 143-154.

4 星紋鏡出土於一九七七年。見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貴南尕馬台》(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16)。

5 一九七四至七五年甘肅廣河齊家坪出土的一面素面鏡。相關報導見嚴文明,〈論中國的銅石並用時代〉,《史前研究》,1984年3期,頁39;劉學堂,《彩陶與青銅器的對話》(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16), 頁167;高西省,〈中國早期銅鏡的發現與研究〉,《中國早期銅鏡》(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頁9。

6 梁上椿,〈古鏡研究總論〉,《大陸雜誌》,5卷5期(1952.9),頁9-13。

7 岳慎禮,〈青銅鏡探源〉,《大陸雜誌》,17卷5期(1958.9),頁16-17。

8 何堂坤,〈銅鏡起源初探〉,《考古》,1988年2期,頁16-17。

9 李亨求,〈銅鏡的源流——中國青銅文化與西伯利亞青銅文化的比較研究〉,《故宮學術季刊》,1卷4期(1984夏),頁29-68;李亨求,〈銅鏡的源流——再論韓國青銅文化的起源〉,《故宮學術季刊》,3卷2期(1985冬),頁45-80。

10 梅原末治,《漢以前的古鏡の研究》(京都: 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 1935)。

11 江上波夫,〈綏遠地方出土古銅鏡の二三に就きて〉,《考古學雜誌》,26卷7号(1936.7),頁395-404。

1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頁103-104。

13 林沅,〈商文化青銅器與北方地區青銅器關係之再研究〉,收入氏著,《林沅學術文集》(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頁262-288。

比較研究，得出了中原地區所見銅鏡來自新疆天山北路¹⁴及來自齊家文化¹⁵等兩種主要觀點。近年隨著河北灤縣後遷義遺址兩面殷墟時期銅鏡出土，北方地帶做為銅鏡自西北向中原傳遞的路徑，也受到學者注意。¹⁶

隨著歐亞草原考古資料的公布及翻譯，一些學者也嘗試跨越當代國界，將中原地區納入更大的地理空間中的評估。在這些研究中，銅鏡與刀、斧等工具一起成為探討歐亞草原與中原地區互動的標誌性器物。俄國考古學者 Elena E. Kuzmina 自一九八〇年代起便開始與美國學者合作，將俄國學者百年來對歐亞草原青銅時代的發現及研究進行英文編譯，成為研究俄國考古材料的重要參考。¹⁷ 在這些著述中，她反覆提及商代晚期安陽地區的銅鏡可追溯至歐亞草原分佈廣泛的安德羅諾沃文化（Andronovo），更接近的來源則是經由新疆再傳到商都所在的安陽。¹⁸ 胡博（Louisa G. Fitzgerald-Huber）就二里頭遺址所見圓形銅片上的十字紋及青海貴南尕馬台出土銅鏡上的星芒紋，認為齊家文化與巴克特里亞及南土庫曼地區所見陶器及銅飾件紋飾的相似性，並提出巴克特里亞·馬爾吉阿納文明體（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 (BMAC), c. 2000-1800 BCE）與齊家及二里頭文化之間的可能關係。¹⁹ 近年張莉延續胡博的觀點，強調應跨越現代國界的研究素材限制，並論述銅鏡在甘青地區齊家文化的出現是受到中亞草原地區西元前第

14 劉學堂，〈論中國早期銅鏡源於西域〉，《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3期，頁112-119；劉學堂，〈中國早期銅鏡起源研究——中國早期銅鏡源於西域說〉，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新疆石器時代與青銅時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頁218-242；劉學堂，《彩陶與青銅器的對話》，頁166-176。

15 李學勤，〈中國銅鏡的起源及傳播〉，收入氏著，《比較考古學隨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57-63；李學勤，〈續論中國銅鏡的傳播〉，收入氏著，《比較考古學隨筆》，頁64-70；宋新潮，〈中國早期銅鏡及其相關問題〉，《考古學報》，1997年2期，頁147-169。

16 張文瑞據河北灤縣後遷義遺址出土的兩面殷墟時期銅鏡，提出兩條銅鏡甘青地區銅鏡東傳路線：一為通過青海、甘肅、內蒙，到河北唐山、遼寧喀左；另一自青海、甘肅到中原，見張文瑞，〈灤縣後遷義遺址商代銅鏡探源〉，《文物春秋》，2017年2期，頁16-19。近年韓金秋提出中原出土的商周有可能來自非中原地區，他也採用後遷義的資料，認為殷墟銅鏡可分為三種，兩種與冀北所見相似，一種與內蒙及關中地區相近。指出「似乎殷墟銅鏡的起源與西北地區（卡約文化）關係較大」，西周銅鏡則是源於卡約文化，而周代所見動物紋鏡則源於冀北、遼西地區，見韓金秋，《夏商西周中原的北方系青銅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134-135、185-187。

17 最具代表性者為 Elena E. Kuzmina,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oston: Brill, 2007);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18 Kuzmina,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 263-264;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104-105.

19 Louisa G. Fitzgerald-Huber, "Qijia and Erlitou: 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s," *Early China* 20 (1995): 17-67. 中譯本見胡博（Louisa G. Fitzgerald-Huber）著，李永迪譯，〈齊家與二里頭：遠距離文化互動的討論〉，收入夏含夷編，《遠方的時習——《古代中國》精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3-54。

二千年紀早期的 BMAC 的影響，之後再經由北方草原地帶以舶來品的形式進入中原。²⁰

對傳統觀點提出挑戰的學者中，以 Diane M. O'Donoghue 最為重要。他由商代晚期及西周時期銅鏡的稀少性認為晚商、西周銅鏡基本均為舶來品，並似對此類器物是否可稱為鏡子感到懷疑，因而在行文多處見到以「reflector（反射物）」及「mirror（鏡）」稱之。²¹ 白雲翔由鑄造技術出發，從新的角度論證商周時期中原地區所見銅鏡均非本地鑄造，直到西元前九世紀才開始自行生產。²² 近年日本學者甲元真之從尕馬台銅鏡出發，提出星芒紋在中亞銅器及凌家灘玉器上的共通性，對過去銅鏡起源的相關討論提出質疑，並就殷墟出土銅鏡之形制，認為與中亞所見不同，具有啟發性。但認為殷墟為凸面鏡、西周以後出現小型鏡及凹面鏡的線性發展說法則有待商榷。²³

（二）早期銅鏡的類別、功能及定義問題

如 O'Donoghue 的懷疑，伴隨銅鏡起源討論的一個根本問題是：如何界定銅鏡及其功能。學界在討論被認為時代最早的尕馬台銅鏡時，便對其功能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多就出土位置認為是胸前配飾。²⁴ 對中原地區最早的銅鏡的認定，則有胡博在討論齊家與二里頭文化的關連性時，逕將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嵌綠松石圓形銅片殘件稱之為銅鏡，使之成為中原地區最早的銅鏡。²⁵ 這些論述均反映了過去學界對早期銅鏡的模糊認定。

這種模糊性所帶來的問題，在出土大量圓形片狀器物的青銅時代遺址中特別

20 Jaang Li, "Long-distance Interactions as Reflected in the Earliest Chinese Bronze Mirrors," in *The Lloyd Cotsen Study Collection of Chinese Bronze Mirrors, Volume II: Studies*, ed.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Los Angeles: Cotsen Occasional Press, UCLA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Press, c 2009-2011), 34-49. 其所指出之北方草原地帶 (the Northern Zone) 包括河套平原以及陝西北部、山西及河北等區域。

21 Diane M. O'Donoghue, *Reflection and Reception: the Origins of the Mirror in Bronze Age China* (PhD thesi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89); "Reflection and Reception: the Origins of the Mirror in Bronze Age Chin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62 (1990): 5-184.

22 白雲翔，〈試論東亞古代銅鏡鑄造技術的兩個傳統〉，《考古》，2010年2期，頁63-77。

23 甲元真之，〈中國青銅鏡的起源と東北アジアへの展開〉，收入西本豊弘、春成秀爾編，《東アジア青銅器の系譜》（東京：雄山閣，2008），頁76-89。

24 宋新潮，〈中國早期銅鏡及其相關問題〉，頁163；高西省，〈論早期銅鏡〉，《中原文物》，2001年3期，頁34-35。

25 胡博，〈齊家與二里頭：遠距離文化互動的討論〉，頁39-40。二里頭嵌綠松石圓形銅片與銅鏡在形制上相去甚遠，此說鮮少為學界採納。

顯著。A. A. 提什金 (A. A. Тишкин) 及 Н. Н. 謝列金 (Н. Н. Серегин) 在討論阿爾泰銅鏡時，便指出考古學者在面對大量此類器物時，對於何者為泡何者為鏡，有許多不同的意見。²⁶ 阿爾泰南邊的新疆天山北路墓地及時代稍晚的甘青地區卡約文化墓葬也出土大量圓形銅牌飾，器類同樣難以鑑別。²⁷ 更顯著的例子來自於西元前六到五世紀遼寧瀋陽鄭家洼子墓地 M6512。墓主人隨葬三種型態的鏡或鏡形飾 (圖 1)。²⁸ 在綜合相關出土資料，劉學堂以今日大興安嶺鄂倫春薩滿巫師服裝綴鏡滿身的形象為參照，提出凡於邊緣有穿孔的圓牌，功能上應是懸掛於薩滿巫師服裝上的裝飾或法器，而非實際用於照容。²⁹ 這種說法得到許多學者支持，認為不論是天山北路或鄭家洼子墓葬中所見的銅鏡多與薩滿信仰有關。³⁰

中原地區晚商及西周時期所見銅鏡數量稀少，但界定問題同樣困擾學者。依據鏡面的弧度，過去研究論述中被稱為銅鏡的晚商及西周時期器物主要有平面、凸面及凹面等三種。對凹面鏡是否可作為照容鏡的懷疑，表現在不少研究論述中。如宋新潮認為陽燧與早期銅鏡「僅僅是同一物體的不同形式而已，之間並沒有本質上的差異。」³¹ 高西省對西周遺址出土的「凹面鏡」有詳細的論述，並羅列眾多學者對個別「凹面鏡」的稱法及定義。綜合分析後，提出與宋新潮完全不同的結論，認為鏡與燧「是使用性質根本不相同的兩類器，是並存的，一照面飾容，一聚光取火。」因此提出「凹面鏡」應正名為陽燧。³² 總體來說，學界雖關注早期

26 A. A. 提什金、Н. Н. 謝列金著，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譯，《金屬鏡：阿爾泰古代和中世紀的資料》(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 76。

27 如青海湟中下西河 M221，墓主人肩膀及手臂側放置了數面素面鈕鏡或鏡形飾，數量更多的是全身上下以及腰帶上的大、小型圓形銅泡。該墓地材料未發表，僅見簡略報導，見和正雅，〈從潘家梁墓地的發掘試談對卡約文化的認識〉，《青海考古學會會刊》，1981 年 3 期。M221 現正陳列於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展覽室內。承鄧淑蘋研究員赴該所參觀時，為筆者拍攝墓葬照片，提供了詳盡的資料，在此致以感謝。

28 瀋陽故宮博物院、瀋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瀋陽鄭家洼子的兩座青銅時代墓葬〉，《考古學報》，1975 年 1 期，頁 141-156。

29 劉學堂，〈中國早期銅鏡源於西域〉，頁 117；劉學堂，《彩陶與青銅器的對話》，頁 174-176。

30 劉學堂，〈中國早期銅鏡源於西域〉，頁 117；劉學堂，《彩陶與青銅器的對話》，頁 174-176；程建，〈試論中國銅鏡的起源和早期映照方式〉，《東南文化》，1992 年 1 期，頁 88-92；韓金秋，〈夏商西周中原的北方系青銅器研究〉，頁 140-141、188；王趁意，〈中國早期青銅鏡紋飾之謎〉，《收藏家》，2004 年 10 期，頁 33-38；劉錚，〈甘青地區史前太陽神信仰初探〉(蘭州：西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

31 宋新潮，〈中國早期銅鏡及其相關問題〉，頁 165。

32 高西省，〈論早期銅鏡〉，頁 32-33。類似觀點另見楊軍昌，〈陝西周原出土西周時期的陽燧——兼論其科學研究價值〉，《故宮文物月刊》，165 期 (1996.12)，頁 132-135；羅芳賢，〈古代的取火用具——陽燧〉，《中國文物報》，1996 年 12 月 29 日；楊軍昌，〈周原出土西周陽燧的技術研究〉，《文物》，1997 年 7 期，頁 85-87；張天恩，〈略說陽燧——被考古發現所忽略的一類銅器〉，《中國文物報》，1997 年 7 月 27 日；楊軍昌、段豔麗，〈中國早期陽燧的幾個問題〉，《東

銅鏡，但在器物的認定上缺乏一定的標準，功能上也多由薩滿的詮釋為主。

(三) 歐亞草原青銅時代及鐵器時代銅鏡

歐亞草原地帶的考古工作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即已取得豐富成果，許多著名的發掘，如巴澤雷克遺址，均始於這一時期。但更多的發掘資料以俄文發表，很少為俄國以外的學者引述。近年隨著歐亞草原俄文考古資料的英譯及中譯，俄國考古資料受到歐美考古學界極大的重視。近十年更有許多歐洲、美國、加拿大、日本的研究機構直接進入俄國、蒙古、哈薩克斯坦等地進行合作發掘。這些均為今日研究歐亞草原與中原地區的互動關係提供了研究基礎。但仍須注意的是，因歐亞草原地域廣闊，今日雖已累積豐碩成果，但考古發掘上仍有大量的區域缺環，青銅時代遺址的定年及文化譜系，也仍有許多待解決的問題。

目前所知歐亞草原最早的圓形銅鏡發現於土庫曼南部及 ВМАС 的農業區中，時代約為西元前三千紀。³³ 青銅時代所見鏡子數量不多，到了青銅時代晚期及鐵器時代，才成為一種較具普遍性的器類。為數眾多的鏡子出土於歐亞草原及中亞，百年來主要的田野發掘資料彙整於俄文期刊 *Археология СССР*。³⁴ 也已有不少俄國學者投入銅鏡的定年、類型學譜系研究及文化屬性的研究。³⁵

歐亞草原，特別是歐亞草原東部的資料多以線描圖的形式發表，在確認質地、鑄造技術及品質上有相當難度。過去主要可依憑的照片資料除展覽圖錄上的少數名品，主要是一八九三年出版的 *L'Age du Bronze au Musée de Minoussinsk*，以黑白照片發表米努新斯克博物館的館藏。³⁶ 近年的重要參考資料為依據阿爾泰國立大學阿爾泰考古學與民族學博物館資料整理出版的《金屬鏡：阿爾泰古代和中世紀的資料》，由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譯成中文。³⁷ 書中所載的早期銅鏡主要為圓

南文化》，2000年8期，頁101-103；王綱懷、陳燦堂，〈中國陽燧技術研究〉，《中國早期銅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40-51。

33 Kuzmina,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 240-241, 263.

34 主要發現特別集中報導於1989、1992年等兩卷。

35 著名者如 S. V. Kiselev 對塔加爾文化銅鏡的研究（轉引自 Kuzmina,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 407）、T. M. Kuznetsova 對斯基泰鏡子的研究（*T. M. Кузнецова Зеркала Скифии VI-III в. до н. э. -- Москва: Индрик, 2002*），及 A. A. 提什金（A. A. Tishikin）及 H. H. 謝列金（H. H. Seregin）對鄂畢河流域（Ob river）出土早期銅鏡的整理（*A. A. Тишкин, H. H. Серегин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е зеркала из памятников эпохи бронзы Верхнего Приобья. // Вестник То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 История vol. 22: 2, 2013 -- 116-119 c.*）。

36 F. R. Martin, *L'Age du Bronze au Musée de Minoussinsk*, Stockholm: Samson & Wallin, 1893.

37 A. A. 提什金、H. H. 謝列金，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譯，《金屬鏡：阿爾泰古代和中世紀的資料》。

形鈕鏡及環柄鏡，其中也包括了許多阿爾泰地區重要的鐵器時代樣本，如阿爾贊（Arzan）及巴澤雷克（Pazyryk）文化的出土品。

在 Kuzmina 發表的綜合性專著中，將歐亞草原銅鏡分為六類：圓形微凹鏡、圓形帶小柄鏡、圓形鈕鏡、方形平鏡、方形鈕鏡、圓形折沿鈕鏡。其中，時代約為西元前十三至九紀的第三類圓形素面鈕鏡分佈最廣。除見於 BMAC 外，也發現於烏拉爾山、哈薩克斯坦中部及東部，更遠達於西伯利亞地區。新疆到安陽出土的早期銅鏡也歸於此類。³⁸

文獻資料表明，銅鏡多發現於女性墓主人頭部或腰部。在功能上，除一般認為的梳妝用具，也有學者提出斯基泰晚期流行的折沿鏡是投擲武器。主流的闡釋方式由人類學或民族誌的角度出發，與前述中國北方地帶銅鏡的解釋模式十分相近，認為銅鏡除可照容外，也可以做為薩滿服飾的標誌，或護身鎧甲。³⁹ T. M. Kuznetsova 更針對凸緣銅鏡集中發現於女性墓的現象，認為鏡背可做為女性儀式中的盛水容器。⁴⁰

（四）小結

綜觀過去的研究，銅鏡起源問題十分熱門。主流研究認為中原地區的銅鏡是源自於草原文化。但因歐亞草原在地理空間上分佈廣闊，文化紛呈，中原銅鏡究竟是來自何處，囿於有限的材料，雖說法繁多，迄今未能形成有完全說服力的共識。

今日已累積豐富的考古資料，在中國境內發現時代上可對應於商至春秋時期的鏡類文物數量頗豐，除見於中原王朝核心區域，如河南、陝西（附錄一），更廣見於新疆、青海、甘肅、內蒙、遼寧等草原文化的範圍內（附錄三），歐亞草原的相關資料也較過去更易於取得、內容也豐富許多。因此，藉由再次整理考古材料，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試圖釐清目前被稱為「銅鏡」的晚商、西周時期銅器的功能，以及晚商、西周以及東周的銅鏡之間是否有傳承關係，或是否有不同的文化淵源。

38 Kuzmina,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 263-264, 407-410.

39 A. A. 提什金、H. H. 謝列金，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譯，《金屬鏡：阿爾泰古代和中世紀的資料》，頁 2。

40 Кузнецова Зеркала Скифии VI-III в. до н. э.; Kuzmina,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 410.

三、草原文化脈絡下的殷墟銅鏡

目前見於報導的殷墟青銅鏡共有六面，除婦好墓（M5）出土四面，⁴¹ 另有侯家莊一〇〇五號墓一面⁴² 及大司空村南地 M25 一面。⁴³ 在過去中國銅鏡起源相關的著述中已有詳細介紹（附錄一：1～6）。這些銅鏡具有相當的共通性，包括圓形、鏡面平直或微凸、鏡背中心為橋形鈕。它們都帶有以鏡鈕為中心的幾何紋飾，與晚商青銅禮器上的紋飾大異其趣。這些型制及紋飾上的特徵使許多學者認為銅鏡非中原地區鑄造，而是舶來品。⁴⁴ 但如前文所述，這些「舶來品」的來源說法頗多，或為齊家、西域，或為內蒙，甚至是更遠的 BMAC。若由前文所述 Kuzmina 對歐亞草原銅鏡的分類看，新疆、甘青地區，甚或殷墟出土的早期銅鏡都可以劃歸為第三種流行於安德羅諾沃文化晚期（約西元前十三至九世紀）的圓形鈕鏡（圖 2）。⁴⁵

安德羅諾沃文化的器物廣泛發現於烏拉山至南西伯利亞葉尼塞河流域之間的區域。⁴⁶ 帶鈕銅鏡作為這一文化晚期的一種標誌性器物，可見於今日吉爾吉斯、哈薩克斯坦、阿爾泰及南西伯利亞等地區。⁴⁷ Kuzmina 提出安德羅諾沃銅鏡經新疆、甘青到達殷墟。⁴⁸ 梅建軍也認為「如果考慮到中亞西部和西亞更早的銅鏡，將新疆早期銅鏡當成銅鏡因素東傳的『驛站』」。⁴⁹ 若圓形鈕鏡在歐亞草原東部地區的傳布首先是藉由安德羅諾沃文化的動能向東推動，我們可以將其文化分佈範圍

4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頁 103-104。

42 高去尋，〈殷代的一面銅鏡及其相關之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9 本下冊（1958.11），頁 658-719。

4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86 年安陽大司空村南地的兩座殷墓〉，《考古》，1989 年 7 期，頁 593、596。

44 林沅，〈商文化青銅器與北方地區青銅器關係之再研究〉，頁 262-288；劉學堂，〈中國早期銅鏡源於西域〉，頁 117；劉學堂，〈中國早期銅鏡起源研究——中國早期銅鏡源於西域說〉，頁 221、240；Jaang, "Long-distance Interactions as Reflected in the Earliest Chinese Bronze Mirrors," 43.

45 Kuzmina,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 263-264, 407-410. 文獻資料雖指出有一些早期銅鏡出土，但發表線圖者極少。

46 David Anthony,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448.

47 常見報導的安德羅諾沃文化橋鈕素面銅鏡如哈薩克斯坦 (Kazakhstan) 的 Borovoe、Kara-Kuduk 遺址，及吉爾吉斯 (Kirghizstan) 的 Shamshi 窖藏。受安德羅諾沃文化影響的地區，包括哈薩克斯坦的七河地區及新疆地區，也出土頗多此類素面橋鈕鏡。見 Kuzmina,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 25, 398, 408-409, figs. 33, 43a, 54, 110;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102, 104.

48 Kuzmina,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 104-105, 251, 263-264.

49 此為劉學堂引述與梅建軍的對談。劉學堂，《彩陶與青銅器的對話》，頁 169。

(如新疆西部)及其周邊(包括甘青地區、中國北方地帶及殷墟)所見的同類型銅鏡視為安德羅諾沃文化的產物,或是由之派生出來的器物。在這樣的概念下,才有可能更有序地追索這種源於安德羅諾沃文化中西部的圓形鈕鏡形式,如何漸次於周邊地區發展,直至殷墟。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在廣大的歐亞草原東部範圍內,安德羅諾沃文化晚期也發展出許多區域文化特徵,形成可辨識的區域性考古學文化。銅鏡由安德羅諾沃文化區傳至中原地區的過程,似也不僅是「中亞(安德羅諾沃)—新疆(天山北路)或甘青(齊家/卡約)—安陽(晚商)」這樣簡單的單一發展。

為探究安德羅諾沃文化圓形鈕鏡出現於中原地區的複雜性,以下先探討新疆、甘肅、青海及北方地區的圓形鈕鏡,再進一步分析殷墟銅鏡的草原因素。

(一) 新疆、甘肅、青海及北方地區圓形鈕鏡的發展

目前所知新疆地區最早的銅鏡集中出土於新疆西北部的哈密天山北路墓地。該遺址分為四期,呂恩國、常喜恩、王炳華原將該墓地的年代定在西元前十五至十三世紀,⁵⁰近年李水城則將之定於西元前二〇〇〇到一五〇〇年。⁵¹該墓地所見銅鏡以素面圓形鈕鏡為主,據劉學堂統計,已出土一百面以上。⁵²如許多學者,包括 Kuzmina、梅建軍、水濤及邵會秋等等,已深入討論的,新疆地區青銅時代文化與安德羅諾沃文化不但在地理位置上相連,大量同類銅器及陶器的發現,可將這一區域視為安德羅諾沃文化的範圍。⁵³

50 呂恩國、常喜恩、王炳華,〈新疆青銅時代考古文化淺論〉,收入宿白編,《蘇秉琦與當代中國考古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頁179-184。

51 李水城,〈西北與中原早期冶銅業的區域特徵及交互作用〉,《東風西漸:中國西北史前文化之進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206-207; Jaang, "Long-distance Interactions as Reflected in the Earliest Chinese Bronze Mirrors," 38.

52 劉學堂,《彩陶與青銅器的對話》,頁168-169。

53 關於安德羅諾沃文化在新疆地區的文化表現,見 Elena E. Kuzmina, "Cultural Connections of the Tarim Basin People and Pastoralists of Asian Steppes in the Bronze Age," in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vol. 2, ed. Victor H. Mair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1998), 63-93; Ke Peng, "The Andronovo Bronze Artifacts Discovered in Gongliu County in Yili, Xinjiang," in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vol. 2, 573-580; Mei Jianjun and Colin Shell, "The Existence of Andronovo Cultural Influence in Xinjiang during the 2nd Millennium B.C.," *Antiquity* 73.281 (1999): 570-578; Mei Jianjun, *Copper and Bronze Metallurgy in Late Prehistoric Xinjiang: Its Cultural Context and Relationship with Neighbouring Regions*,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865 (Oxford: Archaeopress, 2000), 66-67; Philip L. Kohl, *The Making of Bronze Age Eur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37-241; 水濤,〈新疆青銅時代諸文化的比較研究——附論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進程〉,收入氏著,《中國西北地區青銅時代考古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頁6-46; 邵會秋,〈新疆地區

除了安德羅諾沃文化常見的素面鏡，天山北路墓地還發現了人面太陽紋鏡及重圈紋鏡兩種紋飾鏡。人面太陽紋鏡的出土資料未見報導，據已發表照片觀察，這件圓形鈕鏡鏡背中央有一寬大硬直的橋形鈕，凸弦紋鈕座內構成人面圖案，不甚規整的短線環繞著鈕座的外圍。鏡緣似有微微凸起的外緣（圖 3-1、附錄三：4）。⁵⁴ 目前考古未見其他相似的銅鏡，但太陽形象的人面卻多見於南西伯利亞米努辛斯克盆地附近的青銅時代奧庫涅夫（Okunev）文化柱石上（圖 3-2）。因其有太陽光輝般的髮型，俄國考古學者將柱石上的人面泛稱為太陽神，年代定在約西元前二五〇〇至一八〇〇年，較天山北路墓地略早或相當。⁵⁵ 與奧庫涅夫文化石人像相近的石人也發現於新疆北疆的切木爾切克文化，郭物已就兩者之間的關連性進行論述。⁵⁶ 切木爾切克文化石人未見太陽光芒狀的髮型，但銅鏡上出現人面太陽紋，顯示這種形象也進入了新疆地區。⁵⁷

另一類重圈紋鏡共有兩面。一面為四重圈鏡，鏡背中心為硬直的橋形鈕，紋飾以鏡鈕為中心，成四層規則的同心圓狀排列，每層內以許多細小的平行線紋構成輻射格狀紋飾（附錄三：2）。⁵⁸ 另一面為三重圈紋鏡，線格粗略，紋飾渙漫（附錄三：3）。⁵⁹ 此類重圈紋鏡也廣見於中國北方地帶。青海湟中出土兩面，紋飾細節較為粗疏（附錄三：38、39）。⁶⁰ 一九七四年河北青龍曾出土一件直徑約 6 公分的重圈紋鏡。⁶¹ 另有一件兩層重圈紋鏡出土於甘肅平涼，兩層方格間有一留白間隔，

安德羅諾沃文化相關遺存探析》，《邊疆考古研究》，8 輯（2009.12），頁 81-97。

54 劉學堂，《彩陶與青銅器的對話》，頁 168。

55 Юрий Есин Тайна богов древней степи. --Абакан: Хакасский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языка,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тории, 2009, 107-108, 182 с.

56 郭物，〈從石峁遺址的石人看龍山時代晚期中國北方同歐亞草原的交流〉，收入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早期絲綢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頁 58-62。

57 胡博曾提出青海西寧發現的骨柄錐及刀與 Okunev 文化同類物的相似性。不過其結論認為更有可能與賽依瑪—圖爾賓諾相關。見胡博，〈齊家與二里頭：遠距離文化互動的討論〉，頁 33-34。相關討論另見梅建軍、高濱秀，〈塞伊瑪—圖比諾現象和中國西北地區的早期青銅文化：兼評帕爾青格教授“塞伊瑪—圖比諾現象和西伯利亞動物紋飾的起源”一文〉，《新疆文物》，2003 年 1 期，頁 54-55。

58 呂恩國、常喜恩、王炳華，〈新疆青銅時代考古文化淺論〉，頁 183，圖版 81.1。

59 哈密博物館，《哈密文物精粹》（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高西省，〈中國早期銅鏡的發現與研究〉，頁 13-14。

60 李漢才認為湟中兩鏡屬卡約文化。李漢才，〈青海湟中縣發現古代雙馬銅鏡和銅鏡〉，《文物》，1992 年 2 期，頁 16。

61 此鏡只見報導於陳佩芬，〈中國青銅鏡發展概述〉一文，並未查找到其他出版資料或線圖。陳佩芬，〈中國青銅鏡發展概述〉，收入中國青銅器全集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6·銅鏡》，頁 2。

紋飾上較前述多重圈紋鏡簡化。⁶² 瑞典東亞博物館另收藏三件相關的銅鏡。一面是安特生於一九三二年曾報導過的四層重圈紋鏡。該鏡直徑 6.9 公分，收集於今河北張家口張北一帶（附錄三：51）。⁶³ 另一面據傳出於戈壁的重圈紋鏡，直徑 6.5 公分，紋飾也相當接近，但因外圈紋飾已渙漫不清，無法辨識重圈圈數（附錄三：52）。第三件為安特生於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年間購於北京的古董店。直徑 7.4 公分，紋飾差異較大，為七層條帶式重圈紋，凸起的條帶上有以平行短線構成的小方格紋，橋形鏡鈕上有三道弦紋，可能時代較其他重圈紋鏡晚（附錄三：50）。⁶⁴ 這些重圈紋鏡分佈範圍廣，很難判斷源於何處。若以細格紋為特徵看，青海湟中出土的一件銅刀刀柄上有相似的紋飾，或許與重圈紋鏡有關（圖 4）。⁶⁵

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紋飾鏡雖少，但人面太陽紋鏡與北邊奧庫涅夫文化在宗教上的關連性，以及重圈紋鏡所反映的大範圍中國北方地區的物件流動，均顯示新疆地區的銅鏡不是單純承自其西邊安德羅諾沃素面鈕鏡，而是有更複雜的區域互動關係。這樣複雜多元、非單線式發展，更清楚地反映在青海貴南尕馬台星紋鏡（附錄三：36）及傳出於甘肅臨夏的三角紋鏡上（附錄三：45）。

青海貴南尕馬台星紋鏡因帶有紋飾，且有清楚的圖像資料，成為齊家銅鏡的主要代表（圖 5-1、附錄三：36）。該鏡出土於尕馬台墓地 M25，發現於俯身墓主的胸口，墓主週身伴隨海貝、骨貝、綠松石及骨珠，墓內並有陶盆及彩陶雙耳罐。⁶⁶ 該鏡直徑約 9 公分，鏡面鏽結，鏡背外緣以兩道弦紋為框，中間為七角星紋，外框與星紋間順著星角方向填以平行的斜線紋。星紋中間以一道弦紋為鈕座，中央似為一殘斷的小圓鈕。⁶⁷ 鏡緣有兩個並排的小孔，學者多認為這是因為鏡鈕殘斷後為繫掛而設置，並視之為胸前配飾。⁶⁸ 近年任曉燕觀察此鏡指出，兩圓孔

62 高阿申，〈甘肅平涼發現一件商代銅鏡〉，《文物》，1991 年 5 期，頁 96。

63 安特生報導此鏡為瑞典赴蒙傳教士 Joel Eriksson 於內蒙古 Hattin-sum 得到。見 Johan Gunnar Andersson, "Selected Ordos Bronzes," 143-154. Hattin-sum 為今河北張家口張北，參見 R. G. Tiedeman, *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222. 關於清末民初瑞蒙宣道會的介紹。

64 瑞典東亞博物館所藏三面銅鏡資料見 Eva Myrdal ed.,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ulletin No. 77: Shang Period Bronzes* (Stockholm: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009), 228-229.

65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湟中下西河潘家梁卡約文化墓地〉，《考古學集刊》，8 輯（1994.12），頁 59。

66 任曉燕，〈論尕馬台墓地文化屬性及相關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29 期（2016），頁 34-35。

67 嚴文明，〈論中國的銅石並用時代〉，頁 39；陳佩芬，〈中國青銅鏡發展概述〉，頁 1。

68 安志敏，〈中國早期銅器的幾個問題〉，《考古學報》，1981 年 3 期，頁 278。宋新潮，〈中國早

處仍留有與木柄相接的網綁痕，說明這件銅鏡是以柄鏡的方式使用。⁶⁹或許也可能是在鏡鈕損壞後，將使用方式由持鈕改為持柄。類似的作法也見於時代更晚的銅鏡，如冬宮博物館一件約西元前八到七世紀的銅鏡，中間鏡鈕缺損，邊緣有一圓孔，可能用於安柄（圖 5-4）。⁷⁰

胡博以尕馬台星紋鏡上的星芒紋與西元前兩千紀前期 BMAC 流行的青銅印圖案接近，提出 BMAC 文化因素經過了安德羅諾沃文化器物，傳遞到齊家文化（圖 5-2）。⁷¹值得商榷的是，如甲元真之所提出的，安德羅諾沃文化中並未見到相對應的星紋，而類似的帶圓框星紋圖案卻廣泛發現於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圖 5-3）。⁷²似乎說明了這種圖案未必是經由 BMAC 傳播而來，在多種文化中均可能發生。尕馬台星紋與 BMAC 星紋的相似性，很難做為傳播的證據。

另一件傳出於甘肅臨夏的三角紋鏡，直徑 14.6 公分，鏡面微凸，鏡背以小鈕為中心，飾兩層三角紋，三角形內填以規整的平行線紋（圖 6-1、附錄三：45）。⁷³幾何紋飾雖具有北方紋飾鏡的特徵，但若仔細檢視此鏡的細節，則表現出不同的質感。首先在形制上，此鏡尺寸偏大，鏡鈕比例小，不似其他區域銅鏡的寬厚橋鈕，反而更接近圓鈕的形式。紋飾上，與尕馬台星紋鏡上的斜線紋對照，三角紋鏡上的斜線三角紋更加疏朗並富有幾何紋的節奏及規律性。這種三角紋與塞伊瑪—圖爾賓諾現象（Seima-turbino phenomena）青銅刀、斧上的同類斜線三角紋、斜線方格紋及界線紋在線條的寬度比例、疏密及結構安排上，具極高的同質性（圖 6-2）。⁷⁴因此，雖然尚未發現塞伊瑪—圖爾賓諾現象的銅鏡，但這件銅鏡極有可能由塞伊瑪—圖爾賓諾現象相關區域輸入，或在其影響下出現的製品。⁷⁵

期銅鏡及其相關問題》，頁 163；高西省，〈論早期銅鏡〉，頁 34-35。

69 報導見劉學堂，《彩陶與青銅器的對話》，頁 161。

70 此鏡介紹見 Joan Aruz etc. eds.,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the State Hermitage, Saint Petersburg, and the Archaeological Museum, Ufa*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0), 248.

71 胡博，〈齊家與二里頭：遠距離文化互動的討論〉，頁 39-40、50-51。

72 甲元真之，〈中國青銅鏡の起源と東北アジアへの展開〉，76-77。八角星紋圖案在中國的新石器遺址中見於馬家濱、崧澤、良渚、大溪、大汶口及小河沿文化，時代跨度達兩三千年。相關討論見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373-375。

73 中國青銅器全集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6·銅鏡》，圖版 2。

74 Y. B. Serikov, O. N. Korochkova, S. V. Kuzminykh, and V. I. Stefanov, "Shaitanskoye Ozero II: New Aspects of the Uralian Bronze Age,"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37/2 (2009): 67-78; V. I. Molodin, A. V. Neskoro, "Private Collection of Seima-turbino Bronzes from the Irtysh: The Tragedy of a Unique Site Destroyed by Unauthorized Excavations,"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38/3 (2010): 58-71.

75 E. H. 切爾內赫 (E. H. Черных)、C. B. 庫茲明內赫 (C. B. Кузьминых) 及林梅村均認為及林

綜上，新疆、甘青地區素面鏡出土數量雖多，但在文化判定及功能辨識上有其困難。但通過有限的幾件紋飾鏡，可反映出當時不同地區人群間密切且複雜的物質文化交流網絡。不論是新疆或甘青地區，這些銅鏡雖僅以極零星的數量出現，且除重圈紋鏡外均無相同的銅鏡發現，說明銅鏡的使用非單純的複製模仿，更可能是對域外圖像及觀念的借用。

(二) 殷墟銅鏡中的輸入品

依據 Kuzmina 的分類，殷墟出土的六面銅鏡均可歸屬於歐亞草原安德羅諾沃文化影響下的產物。但每面都帶有幾何紋飾的作法，則與西北地區的紋飾鏡相關。

已有許多學者論述婦好墓四面銅鏡的草原特徵（圖 7）。⁷⁶ 據紋飾可分為兩類：重圈形圖案（圖 7-1、4）及四分型圖案。（圖 7-2、3）重圈形圖案中的六重圈紋鏡（M5：45），與新疆天山北路及中國北方地帶銅鏡有明顯的共性，最有可能由甘青地區發展起來，傳布至中國北方地帶。另一件重圈紋鏡以凸弦紋分為三層，每層內填一周葉脈紋。（M5：41）。相近的葉脈紋可見於北方地區的一些銅刀刀柄上，如河北靈壽西木佛村出土的一件環首銅刀（圖 8-6）。⁷⁷

兩件四分型圖案銅鏡構圖基本一致（圖 7-2、3）。以橋形鏡鈕為中心，四分的方式布列四組發散式的葉脈紋，最外為一周乳丁紋。其中一件（M5：75）鏡緣乳丁排列及大小參差不齊，且部分乳丁未鑄出，線條也不十分規整，顯示在鑄造上較另一件簡便（圖 7-3）。相較於其他銅鏡紋飾，這兩件銅鏡的葉脈紋特別纖細，外緣的乳丁紋不見於其他地區的銅鏡，格外具有特色。若將乳丁及纖細線條做為這兩面銅鏡的紋飾特徵，則可以在北方地區，特別是晉陝地區的本地青銅器上找到共通點。成排的乳丁，以較大的比例及形式，見於直刃的穿釜刀上（圖 8-3）。⁷⁸

梅村均認為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的斜線紋器物發現於南西伯利亞卡拉蘇克文化，認為中國境內所見賽依馬—圖爾賓諾特徵或許是經由卡拉蘇克而來。見切爾內赫、庫茲明內赫著，王博、李明華譯，《歐亞大陸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瑪—圖爾賓諾現象》（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270；林梅村，〈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與史前絲綢之路〉，《文物》，2015 年 10 期，頁 59；林梅村，〈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在中國〉，《考古與文物》，2016 年 2 期，頁 98-100。

76 如：林云，〈商文化青銅器與北方地區青銅器關係之再研究〉，頁 262-288；Robert W. Bagley, "Shang Archaeolog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eds.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7-198. Linduff, "Why have Siberian Artifacts been Excavated within Ancient Chinese Dynastic Borders?" 364-366.

77 正定縣文物保管所，〈河北靈壽縣西木佛村出土一批商代文物〉，《文物資料叢刊》，5 卷（1981），頁 118。

78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編，《陝北出土青銅器 3》（成都：巴蜀書社，2009），頁 518-521。

在一些小件工具，如圖 8-1 銅鑄所示，可見到小乳丁及細線紋構成的紋飾。陝西延川縣馬家河鄉用斗村出土的一件具有本地特色的環首刀柄部至刀面間帶有纖細的直線紋及三角紋（圖 8-5）。⁷⁹ 更接近的例子見於陝西出土的一件葉脈紋銅斧，可與婦好墓銅鏡上的葉脈紋對應（圖 8-2）。⁸⁰

（三）殷墟銅鏡中的仿製品

侯家莊一〇〇五號墓出土的銅鏡直徑約 6.7 公分，鏡體小，鏡面凸（圖 9-1、附錄一：5）。⁸¹ 鏡背中心為一比例寬大的橋形鈕，紋飾以鏡鈕為中心，分為內外兩區。內區等分成四份，各填以不同方向的平行線紋。外區則為連續的 3 紋。如高去尋所提出的，外區的連續三十四條 3 紋「構成殷代其他器物上可見的龍或蛇身形紋飾」。⁸² 與殷墟出土青銅器上的紋飾對比，這種不見於北方地帶的連續 3 紋多見於晚商動物紋的獸角或身上，是典型的殷墟紋飾（圖 9-2）。⁸³

在商王朝中心製作帶有域外特徵的器物，特別是帶有北方青銅器特徵的器物，已有相當多的認識。⁸⁴ 其中又以獸首刀及鈴球器（如弓型器等）最具代表性，主要的作法即是在草原形式的器物上，加上商文化特徵的紋飾。⁸⁵ 將一〇〇五號墓銅鏡放在同一脈絡下檢視，器形及平行線紋帶有北方地區的特徵，以 3 紋表現動物身上鱗片則是商人的傳統，說明這件銅鏡也是安陽工匠模仿草原系器物的一環。

79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編，《陝北出土青銅器 3》，頁 468。

80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編，《陝北出土青銅器 3》，頁 394。

81 高去尋，〈殷代的一面銅鏡及其相關之問題〉，頁 685-719。

82 高去尋，〈殷代的一面銅鏡及其相關之問題〉，頁 690。

83 參考對比之例見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牛尊（M54：475）、方彝（M54：183）、安陽鑄造之獸首刀（M54：300）等。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商代墓地》（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頁 121、125、166-168。

84 如林沄，〈商文化青銅器與北方地區青銅器關係之再研究〉，頁 262-288；烏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銅器〉，《考古學報》，1985 年 2 期，頁 135-156；杜正勝，〈歐亞草原動物文飾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 本 2 分（1993.6），頁 231-408；黃銘崇，〈畜牧者與農耕者之間——早期鄂爾多斯文化群與商文明〉，《“周邊”與“中心”：殷墟時期安陽及安陽以外地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頁 23-98。

85 相關討論見高去尋，〈刀斧葬中的銅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7 本（1967.3），頁 355-381；高去尋，〈西北岡出土的殷代弓形銅器〉，《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刊》，2 期（1973.11），頁 1-9；杜正勝，〈歐亞草原動物文飾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頁 236-251；林沄，〈青銅掛韁鈎補說〉，《邊疆考古研究》，6 輯（2007），頁 103-109；鄧向平，〈略論商周青銅弓型器的型制演變〉，《華夏考古》，2007 年 1 期，頁 94-101；左駿、李荔，〈“弓型器”用途與來源再考〉，《華夏考古》，2009 年 1 期，頁 125-128；吳曉筠，〈馬車在早期東西交流中的地位與交流模式：西元前 2000-1200 年〉，《故宮學術季刊》，28 卷 4 期（2011 夏），頁 108-110；黃銘崇，〈畜牧者與農耕者之間——早期鄂爾多斯文化群與商文明〉，頁 59。

(四) 商人的銅鏡觀

O'Donoghue 提出商人雖擁有鏡子，卻沒有將其作為鏡子使用。⁸⁶ 如前所述，殷墟所見銅鏡有外地引進及本地模仿兩類，說明晚商貴族既擁有這種域外器物，也樂於模仿製作，對其型制及特徵應不陌生。在鑄造上，銅鏡的製作僅需兩塊合範，對於能鑄造出大量繁複青銅禮器的商人來說，應是再簡單不過的器物。另一方面，在一些安陽出土的器物上仍可見到光亮銀白的表面，例如侯家莊一〇〇五號墓銅鏡鏡面局部仍保有「白銅」的質感。⁸⁷ 西北崗 1022 號墓出土之中爵綠鏽下露出銀白的質地，⁸⁸ 表示商人也能輕易完成銅鏡所需的合金配比。因此，若商人能理解並接受銅鏡的映照功能，應能迅速取代當時較為不便的盛水照容習慣。⁸⁹

相對於草原地區大量出土素面鏡，殷墟出土的銅鏡數量雖不多，但每面銅鏡的鏡背均施以接近滿裝的幾何紋飾。這些紋飾表現了草原文化，與殷墟富宗教性的繁複禮儀銅器紋飾不同。張莉曾提出殷墟銅鏡是身份標誌物，⁹⁰ 但檢視出土銅鏡的墓葬規模，除婦好為高級貴族外，大司空村 M25 墓葬規模不大，西北岡一〇〇五號墓銅鏡出土於多人殉人墓，顯示銅鏡持有者的社會身分落差大，銅鏡在商王朝不具有禮儀及宗教性質，商人可能也完全未將銅鏡作為照容工具，而更樂於接受這是一種反映域外文化的器物。

再次檢視婦好墓隨葬品的構成方式，更可說明銅鏡在商人眼中的異域特徵。該墓隨葬品以多元化著稱，林嘉琳 (Katheryn M. Linduff) 認為墓中出土的銅鏡及其他北方系銅器代表了婦好的草原背景，並反映了商王國與外部聯盟聯姻的歷史。⁹¹ 林嘉琳雖據其中所見的多樣化草原器物認為婦好是來自草原的新娘，⁹² 但出

86 O'Donoghue, *Reflection and Reception*; "Reflection and Reception: the Origins of the Mirror in Bronze Age China," 29.

87 高去尋，〈殷代的一面銅鏡及其相關之問題〉，頁 689。

88 李永迪編，〈殷墟出土器物選粹〉（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9），頁 26。

89 高去尋以商代甲骨文字形說明商人臨水鑑容，見高去尋，〈殷代的一面銅鏡及其相關之問題〉，頁 691-692。宋新潮討論過銅鏡在商王都出現後並未改變以水鑑容的方式，見宋新潮，〈中國早期銅鏡及其相關問題〉，頁 165。

90 張莉曾提出殷墟出土的銅鏡是身份的標誌物，見 Jaang, "Long-distance interactions as reflected in the earliest Chinese bronze mirrors," 44.

91 Katheryn M. Linduff, "Why have Siberian Artifacts been excavated within Ancient Chinese Dynastic Borders?" in *Beyond the Steppe and the Sown*, eds. D. L. Person et al.,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6), 364-366.

92 Linduff, "Why have Siberian Artifacts been excavated within Ancient Chinese Dynastic Borders?" 364-366.

自廣袤地域的新石器時代紅山、良渚、石家河及龍山文化的古玉、來自南方的有領玉璧及環、北方的銅鏡，在認定婦好是一位廣博傑出的收藏家上，更具有說服力。⁹³ 在商文化中，銅鏡非屬宗教，非屬身份，也非屬生活，而更多地反映了他們對域外文化或周邊異族人群的獵奇心理。

四、西周銅鏡的來源

相對於殷墟發現的六面，西周時期銅鏡數量略為增加。據現有資料統計，約有二十餘面，多集中於西周早期（附錄一：7～25）。這些銅鏡均為圓形鈕鏡，但與殷墟的幾何紋鏡不同，全為素面鏡。如前文所述，許多早期銅鏡起源及發展的論述，將商和西周銅鏡放在連續發展的脈絡下討論，但將兩者放在一起比較，卻反映了不同的文化特徵。

（一）西周銅鏡的草原因素

將西周早期銅鏡與前述殷墟、甘青及新疆出土的銅鏡對比，可看出明顯的區別。首先，西周銅鏡均為素面鏡。若與新疆天山北路墓地及甘青地區的素面鏡比較，雖有部分型制相似，但西周時期，特別是西周早期銅鏡，鏡鈕多具細窄、兩端尖瘦的橄欖形特徵。如寶雞市郊出土的一面素面鏡，鏡鈕細長，中間高起、兩端尖平，側面形似三角，中間的鈕孔很小（圖 10-1，附錄一：8）。⁹⁴ 這種橄欖形鈕素面鏡除多集中於陝西寶雞及周原等西周早期的核心區域，也見於如河南濬縣辛村西周早期衛國墓葬（M42）（圖 10-2）。⁹⁵ 可見其出現與周人的興起有關。

西周時期的銅鏡型制具有歐亞草原系銅鏡的特徵，雖可將之歸屬於大範圍歐亞草原銅鏡脈絡，但與前述西北或北方地區銅鏡缺乏共性，也與中亞地區的安德羅諾沃文化銅鏡不同。依據素面、小尺寸及橄欖形鈕等幾項特徵檢視歐亞草原地

93 林巴奈夫及巫鴻便曾討論過婦好墓中多樣化戰利品及古董收藏品的特徵，見林巴奈夫，《中國古玉研究》（臺北：藝術圖書公司，1997），頁 35-97；巫鴻，《黃泉下的美術》（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頁 170、174。韓金秋也認為殷墟所見銅鏡可能是貴族珍稀的收藏品，見韓金秋，《夏商西周中原的北方系青銅器研究》，頁 140-141。相關討論另見吳曉筠，〈再思武丁時代〉，收入蔡汝芬、朱乃誠、陳光祖編，《商王武丁與后婦好——殷商盛世文化藝術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頁 339-340。

94 王光永、曹明檀，〈寶雞市郊區和鳳翔發現西周早期銅鏡等文物〉，《文物》，1979 年 12 期，頁 90，圖版 9；中國青銅器全集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6·銅鏡》，圖版 5。

95 郭寶鈞，《濬縣辛村》（北京：科學出版社，1964），頁 12。發掘報告中並未發表此鏡圖像，該筆資料發表於梅原未治，〈周代の古鏡〉，《東方學》，35 輯（1968），頁 6。

區銅鏡，相似者集中發現於南西伯利亞卡拉蘇克文化，也見於蒙古戈壁的東邊（圖 10-3、4）。⁹⁶ 西周銅鏡與南西伯利亞銅鏡的相似性說明了西周銅鏡與殷墟無承繼關係，周人與商人接觸使用銅鏡的人群不同，且可能與南西伯利亞地區更為相關。

目前已知的西周同時期周文化區以外的銅鏡數量非常稀少，僅有少量線索可探討來源。陝西淳化官莊出土一件型制較簡的格紋鏡，僅有一圈格紋，中間夾有圓點紋，頗有重圈紋鏡的意味，或許是重圈紋鏡的地方簡化形式（附錄三：63）。⁹⁷ 與銅鏡同出的還有商式青銅鼎及北方式刀等，張長壽、梁星彭指出屬於黑豆嘴類型文化，⁹⁸ 年代一般認為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之間。⁹⁹ 與其他重圈紋鏡的粗厚橋鈕對照，這面銅鏡帶有細窄的橄欖形鈕，與陝西扶風北呂墓地 M3 出土的一件先周時期素面鏡鏡鈕十分接近（附錄一：7）。¹⁰⁰

甘肅崇信于家灣墓地的發現表現了銅鏡在人群間可能的流動。目前已發現的兩面素面鈕鏡集中於一座墓葬（M38）中，鏡面微鼓，一面直徑 8.5 公分，為橄欖式鈕（附錄一：21）；另一面直徑 8 公分，帶有少見的兩端寬、中間窄的覆斗式鈕（附錄一：22）。¹⁰¹ 于家灣橄欖式鈕鏡的發現或許表現了該地與周人之間物品傳遞上的聯繫。覆斗式鈕鏡則與時代相當的新疆特克斯縣闊課蘇西¹⁰² 以及甘肅民勤沙井¹⁰³ 等遺址所見相似，表現了于家灣墓地的西向連結，反映出該區域在西周時期區域間複雜且多元的交往活動（附錄三：22、48）。

（二）西周銅鏡的功能

如前所述，過去西周銅鏡研究的主要爭議點在鏡與陽燧的區別。由於平、凸、凹三種鏡面均能夠達到反射的效果，因此在眾多考古報告及研究論著中常被

96 Э. А. Новгородова Ножи карасук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из Монголии и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 *Монгольски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Н СССР, 1962, рис.44

97 姚生民，〈陝西淳化出土的商周青銅器〉，《考古與文物》，1986 年 5 期，頁 12-22。

98 張長壽、梁星彭，〈關中先周青銅文化的類型與周文化的淵源〉，《考古學報》，1989 年 1 期，頁 5-6。

99 高西省，〈中國早期銅鏡的發現與研究〉，頁 4-5。

100 羅西章，〈北呂周人墓地〉（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頁 51，圖版 24.1。

101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崇信于家灣周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 33-34、92。

102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特克斯縣闊克蘇西 2 號墓群的發掘〉，《考古》，2012 年 9 期，頁 10-11。

103 李水城，〈沙井文化研究〉，《東風西漸：中國西北史前文化之進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 128-129。

歸於一類（附錄二）。

由映照的角度看，凸面鏡可以略微放大反射對象，凹面鏡則是將對象縮小，並使成像顛倒。殷墟所見銅鏡基本均為凸面鏡，尺寸偏小的侯家莊西北岡一〇〇五號墓及大司空村 M25 銅鏡的凸面更為明顯（附錄一：5、6）。在西周時期的發現中，接近平面的鏡子數量最多。鏡面明顯凸出者，如陝西武功黃家河出土的一面直徑 8.8 公分的銅鏡，¹⁰⁴ 以及陝西寶雞鳳翔一面直徑 7.22 公分的銅鏡，¹⁰⁵ 尺寸在中、小型之間。若檢視漢代以後銅鏡鏡面尺寸與弧度之間的關係，便可明顯發現，在能鑄造大型銅鏡的時代（如漢、唐、金、元等），鏡面以平直為主，而在以小型鏡為主的東漢末至魏晉時期，直徑 10 公分以內的銅鏡鏡面多鑄成明顯的凸面。

總體來說，西周時期尺寸相當的平、凸面與凹面鏡同時存在，平面及凸面鏡作為鏡子，凹面者則如學者推測，可能做為陽燧，也可能做為器蓋使用。這種凹面器在西周早期僅有二件，分別出土於北京昌平白浮¹⁰⁶ 及陝西扶風黃堆（附錄二）。¹⁰⁷ 黃堆出土的西周早期凹面器反光面凹弧最甚，最有可能達到陽燧聚光的效果。該器帶有橄欖式鈕，與前述西周早期流行的銅鏡鏡鈕一致，表示其與橄欖式鈕鏡有共同來源。

五、東周：銅鏡的中原化進程

銅鏡在商、西周時期的少量存在，說明銅鏡是外來觀念、稀有、不屬於日常。據紋飾、鏡鈕型態判斷，有多種來源途徑，而非單一源於新疆、甘肅或蒙古。過去的研究依據一些具有凹面特徵器物的典型周人紋飾，包括陝西扶風劉家的西周中晚期重環紋器、¹⁰⁸ 河南三門峽上村嶺虢國墓地一件春秋虢龍紋器，¹⁰⁹

104 中國科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武功發掘隊，〈1982-1983 年陝西武功黃家河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8 年 7 期，頁 611。

105 王光永、曹明禮，〈寶雞市郊區和鳳翔發現西周早期銅鏡等文物〉，《文物》，1979 年 12 期，頁 90-91。

106 如發現於西周早期昌平白浮遺址的凹面鏡，普遍為學者認為銅鏡，但其發掘報告原將之稱為「圓鏡形飾」，其功能「疑為銅鏡或器蓋」。見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地區的又一重要考古收穫——昌平白浮西周木槨墓的新啟示〉，《考古》，1976 年 4 期，頁 257-258。

107 蔡汝芬、蔡慶良編，《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頁 190。

108 羅西章，〈扶風出土的商周青銅器〉，《考古與文物》，1980 年 4 期，頁 16。

109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嶺虢國墓地》（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頁 14，圖版 8.1。

認為體現了銅鏡這一外來物的本地化進程。¹¹⁰但仔細檢視這些器物，凹面的特徵不符合照容銅鏡的標準（附錄二）。¹¹¹

將晚商幾何紋鏡、西周素面鏡與戰國晚期定型化的中原銅鏡進行對比，可歸納出戰國時期中原本土銅鏡的主要特徵為圓形、小橋形鈕，鏡緣多為一週素面帶（圖 11-1、2，13-1、3）。紋飾方面，多以銅禮容器上流行的羽紋、捲雲紋及菱格紋為地，以成排方式格狀布列；主紋則取自銅禮容器或織品上的龍紋、鳳紋、動物紋、山字紋及植物紋，以鏡鈕為中心佈列。¹¹²如由戰國銅鏡的特徵往前追溯，最早的例子或許應為春秋中期陝西鳳翔秦公一號大墓出土的一面蟠螭紋鏡（附錄一：29）。¹¹³此鏡為圓形小橋鈕鏡，紋飾以同心圓方式布列，鏡鈕周圍為素面帶，外環一圈規整的 S 形紋，其外為兩圈典型秦國蟠螭紋，外緣處為一周素面帶。若與其時代稍早的上村嶺虢國墓地出土的兩面春秋早期素面鏡（附錄一：27、28）及一面帶有北方草原特色的動物紋雙鈕鏡（附錄一：26）對比，秦公一號大墓銅鏡的強烈本地特色，首次展現出有意識地將銅鏡中原化的意圖。據此，中原銅鏡開始本地化的時間，應為春秋中期以後。秦國在地理位置上與草原民族接觸的便利性，或許即是觸發鑄造本地銅鏡的原因。¹¹⁴

如許多學者已提出的，中原銅鏡的大發展是在戰國時期。O'Donoghue 提出華夏鑄鏡最早的線索在山西侯馬遺址出土的陶範中，後由北方擴展至南方，終於戰國中期大興於楚，才得以快速地全面取代「以鑑照容」的傳統。¹¹⁵梅建軍指出銅

110 如 Jaang, "Long-distance Interactions as Reflected in the Earliest Chinese Bronze Mirrors," 45; 梅建軍,〈關於新疆出土早期銅鏡研究的幾個問題〉,《吐魯番研究——第二屆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頁 246-251。

111 持此論者如宋新潮,〈中國早期銅鏡及其相關問題〉,頁 151-153; Jaang, "Long-distance Interactions as Reflected in the Earliest Chinese Bronze Mirrors," 45。

112 A. Bulling, "The decoration of some mirrors of the Chou and Han periods," *Artibus Asiae* 18.1 (1955): 20-45; 馬今洪,〈上海博物館藏銅鏡綜述〉,收入上海博物館編,《練形神冶 瑩質良工——上海博物館藏銅鏡精品》(上海:上海博物館,2005),頁 13-14; Colin Mackenzie, "Mirror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The Lloyd Cotsen Study Collection of Chinese Bronze Mirrors, Volume II: Studies*, ed.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Los Angeles: Cotsen Occasional Press, UCLA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Press, c 2009-2011), 63-70。

113 據報導,該墓出土一面紋飾鏡及一面素面鏡。見宋遠茹,〈秦鏡と秦人の“破鏡”習俗について〉,《秦王朝と兵馬俑—発掘された歴史の実像—》(2015年12月19日發表於東京国立博物館舉辦之演講會),頁 12。

114 已有不少學者討論秦國與草原民族的關係,金器的使用也是一項重要指標。相關討論參見梁雲,〈考古學上所見秦與西戎的關係〉,《西部考古》,2016年2期,頁 112-146。

115 O'Donoghue, *Reflection and Reception*; "Reflection and Reception: the Origins of the Mirror in Bronze Age China."

鏡是游牧文化傳統中的一環，直到戰國時期才融入中原的青銅工藝體系。¹¹⁶

戰國時期的銅鏡主要包括兩種形式：圓形鈕鏡及雙層透雕鏡。圓形鈕鏡的發展十分廣泛且迅速，從山西侯馬鑄銅遺址的鏡範，¹¹⁷到南方流行的各式銅鏡，基本上都維持著同一型式：圓形片狀、鏡背以小鈕為中心布列紋飾，主紋飾區外有一周素面帶，邊緣是一微微高起的凸緣或寬平沿（圖 11-1、2）。由戰國時期所確立起來的這種圓鈕凸緣鏡式及同心圓布列紋飾的方式，與其說是來自歐亞的影響，不如說是東周以來銅容器器蓋紋飾布列方式的延伸。這種形式成為其後漢代至清代銅鏡的基本格式，各時代僅於其間填以表現時代特色的裝飾，鮮少對之進行改動。¹¹⁸ 第二類雙層透雕鏡數量稀少，除集中於公私典藏，也偶見考古出土，如湖北江陵及河南洛陽等地的發現（圖 11-3）。¹¹⁹ 這種銅鏡有方形及圓形兩種，主要特徵為雙層嵌合，鏡背紋飾透雕層中央帶有一小鈕，鏡背緣多有一寬邊，鏡面層嵌入鏡背層內。紋飾多以鳥獸為主，分層透雕鑄造，使之具強烈的層次感及立體感。陳佩芬據這種雙層鏡的鏽蝕特徵，提出目前可見之收藏品可能多出於三晉地區的黃土地帶。¹²⁰ 上海博物館藏有一面戰國四虎紋鏡，型制雖為圓形鈕鏡，但鏡背紋飾極具立體感，佈局與晉地流行的透雕動物牌飾十分接近，頗有將雙層透雕鏡合鑄的效果。¹²¹

圓形鈕鏡及雙層透雕鏡在春秋中晚期至戰國時期出現，反映中原地區對外來觀念的接受及本地冶鑄的創發。銅鏡在歐亞地區有悠久的傳統，也為商人及周人知悉。當這一種器物的性狀及功能被中原地區貴族接受後，雖以慣常的圓形鈕鏡為主要形式，但在紋飾上展現強烈的本地色彩，並開發出獨特的雙層鏡。這些銅鏡與同時期亞洲內陸流行的柄鏡、平面圓鏡及高折沿圓鏡均有明顯的差異，為中原地區獨樹一幟的物品（圖 12）。¹²²

116 梅建軍，〈關於新疆出土早期銅鏡研究的幾個問題〉，頁 246-251。

11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鑄銅遺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頁 174-175。

118 已有許多出版品介紹漢代以後銅鏡的發展，最具代表性者為中國青銅器全集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6·銅鏡》；Lothar von Falkenhausen ed., *The Lloyd Cotsen Study Collection of Chinese Bronze Mirrors, Volume I: Catalogue* (Los Angeles: Cotsen Occasional Press, UCLA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Press, c 2009-2011)。以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藏品為例，見吳曉筠編，《皇帝的鏡子——清宮鏡鑑文化與典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

119 中國青銅器全集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6·銅鏡》，圖版 15-19。

120 陳佩芬，〈中國青銅鏡發展概述〉，頁 5-6。

121 中國青銅器全集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6·銅鏡》，圖版 30。

122 亞洲內陸於西元前八至一世紀的銅鏡形式，見 *Институте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тепная полоса азиатской части СССР в Скифо-сарматское время. Серия. // Археология СССР. Том 12. --*

六、結語

銅鏡雖曾於晚商、西周時期經由不同的途徑出現於中原地區，但其最終於戰國時期成為中原文化的一種標誌性器物，應被視為認識歐亞銅鏡的性狀、功能後，在本地的工藝傳統中自行創作的一類器物，而非源於歐亞地帶的某處，或承繼於商或西周的傳統。

至少在戰國時期開始，中原鑄造的銅鏡所展現的獨特美感成為歐亞人群喜愛的物品，在考古發現中，出土範圍遠達黑海北岸，甚至還有許多歐亞人群對之進行仿造的例子。¹²³ 最為特殊者為哈薩克斯坦採集的一件西元前三到二世紀歐亞草原流行的小尖柄鏡（圖 13-1）。學者多將其上紋飾解讀為六角星紋，但仔細觀察紋飾結構，其原形為戰國時期流行的六山紋鏡（圖 13-2）。¹²⁴ 另一方面，歐亞草原的銅鏡特徵似也影響著中原地區的銅鏡形式。如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銅鏡上常見的三弦紋鈕與哈薩克斯坦斯基泰文化阿爾贊（Arzan）二號墓出土銅鏡上的三弦鈕相近，兩者間可能有模仿關係（圖 13-3、4）。¹²⁵

雖然有許多學者對早期銅鏡的神秘性進行推測，¹²⁶ 但就中原文化脈絡看，從商代晚期到春秋時期的零星發現及異文化特徵，到戰國時期中原地區墓葬中銅鏡與妝奩用具共置一處的現象，¹²⁷ 銅鏡不論在紋飾或出土位置上，均未表現出特殊的宗

Рыбаков Б.А. (ред.), 1992, 374, 377, 379, 411-414, 437 с.

123 E. Loubo-Lesnitchenko, "Mirrors in the Minusinsk Basin," *Artibus Asiae* 35.1/2 (1973): 25-61; 白雲翔,〈漢式銅鏡在中亞的發現及其認識〉,《文物》,2010年1期,頁78-86; Ursula B. Brosseder, "A Study on the Complexity and Dynamics of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in Late Iron Age Eurasia," *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 along the Eurasian Steppe Zon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Bonn: Universität Bonn Inst. f. Vor- u. Frühgeschichtliche Archäologie, 2015), 246-249.

124 Stark Sören and Karen S. Rubinson eds. *Nomads and Networks: The Ancient Art and Culture of Kazakhst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178. 甲元真之,〈中國青銅鏡の起源と東北アジアへの展開〉一文曾引述此一材料,並與尕馬台鏡進行對比。但他將此器稱為圓盤形裝飾品,與 Stark Sören 等將之稱為銅鏡的理解方式不同,見甲元真之,〈中國青銅鏡の起源と東北アジアへの展開〉,頁76-77。

125 Konstantin v. Cugunov, Hermann Parzinger, Anatoli Nagler, *Der skythenzeitliche Fürstengurgan Aržan 2 in Tuva (Archäologie in Eurasien)* (Mainz am Rhein: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2010), taf. 21, 42.

126 如馮時認為三門峽虢國墓地之動物紋鏡表現四象,見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頁314-315; 王煜提出自晚商起,銅鏡圖像便蘊含天地精神信仰的觀念,見王煜,〈殷墟婦好墓出土銅鏡寓意試探〉,《中原文物》,2014年2期,頁57-59; 王煜,〈象天法地:先秦至漢晉銅鏡圖像寓意概說〉,《南方文物》,2017年1期,頁188-202。

127 銅鏡與妝奩的討論,見陳耘,〈鏡奩梳篦各異工〉,《大觀》,2010年2月,頁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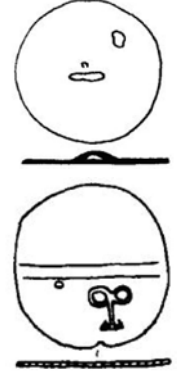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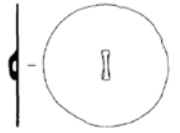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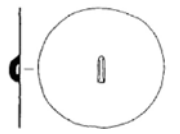

教性，反而更貼近生活。銅鏡在術數上的發展與靈力的建立，應是漢代以後的事情了。¹²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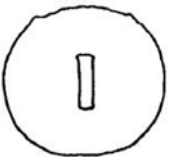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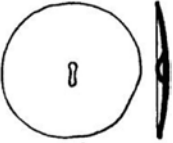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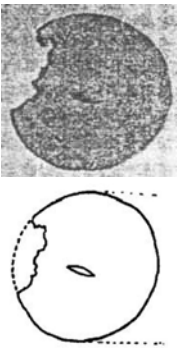

[後記] 本文為 102 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中國銅鏡的源流」(NSC 102-2410-H-136-001) 研究成果之一。赴俄考察期間承侯啟平教授、李巧教授、何耀旭僑領、謝欣好博士及駐莫斯科代表處盧雲賓組長關照，研究過程中有賴學友 Yury Esin、許涵、佘國瑩、葉乃婕及顏子軒協助，謹此致謝。兩位審查人不厭其煩為本文之內容及寫作提出許多寶貴意見，本文才得以完成，在此特申謝忱。惟一切文責由作者自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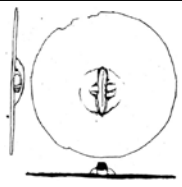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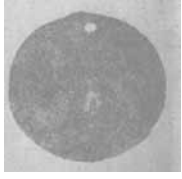


128 已有許多著作討論漢代博局銅鏡與戰國術數間的關係。其中尤以李零及曾藍瑩近年的研究最為重要。李零對博局圖像的研究，如〈跋中山王墓出土的六博棋局—與尹灣《博局占》的設計比較〉、〈說漢陽陵“羅經石”遺址的建築設計〉，收入氏著，《入山與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 177-200。曾藍瑩對漢代銅鏡的研究如 Lillian Lan-ying Tseng, “Representation and Appropriation: Rethinking the TLV Mirror in Han China,” *Early China* 29 (2004): 163-215; “Positioning the Heavenly Horses on Han Mirrors,” in *The Lloyd Cotsen Study Collection of Chinese Bronze Mirrors, Volume II: Studies*, ed.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Los Angeles: Cotsen Occasional Press, UCLA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Press, c 2009-2011), 88-99.

附錄一 中原地區晚商至春秋時期出土銅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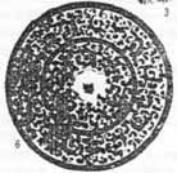


時代	序號	圖	出土地點	尺寸(公分)	鈕式	形制	資料來源
晚商	1		殷墟婦好 M5:45	直徑 11.8 厚 0.2 鈕高 0.8	橋形	圓形	《殷墟婦好墓》
	2		殷墟婦好 M5:41	直徑 7.1 厚 0.2 鈕高 0.4			
	3		殷墟婦好 M5:786	直徑 12.5 厚 0.4 鈕高 1			
	4		殷墟婦好 M5:75	直徑 11.7 厚 0.2 鈕高 0.7			
	5		侯家莊西北崗一 〇〇五號墓	直徑 6.7	橋形	圓形	高去尋 1958
	6		大司空村南地 M25:20	直徑 7.5 厚 0.3	橋形	圓形	《考古》1989 年 7 期

時代	序號	圖	出土地點	尺寸(公分)	鈕式	形制	資料來源
西周	7		陝西扶風北呂 (先周)	直徑 7.8 厚 0.09	橄欖形	圓形	《北呂周人墓地》、高西省 2016
	8		陝西寶雞市郊區 (先周、西周早)	直徑 6.5 厚 0.22	橄欖形	圓形	《文物》1979 年 12 期
	9		陝西寶雞鳳翔縣 (先周、西周早)	直徑 7.22	橋形	圓形	《文物》1979 年 12 期
	10		陝西鳳翔南指揮西村 (先周、西周)	直徑 7.1	橄欖形 2、無鈕 1	圓形	《考古與文物》1982 年 4 期
	11		陝西旬邑下魏洛 M1:17 (西周早期)	直徑 10 厚 0.2	橋形或橄欖形	圓形	《文物》2006 年 8 期
	12		陝西旬邑下魏洛 M1:18 (西周早期)	直徑 8.8 厚 0.2	橋形或橄欖形	圓形	《文物》2006 年 8 期
	13		陝西旬邑下魏洛 M1:19 (西周早期)	直徑 10.5 厚 0.2	橋形或橄欖形	圓形	《文物》2006 年 8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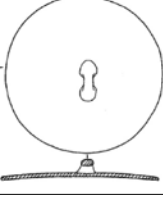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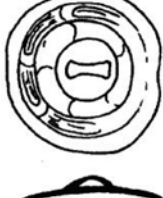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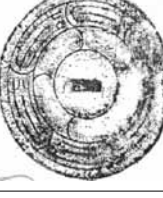
時代	序號	圖	出土地點	尺寸(公分)	鈕式	形制	資料來源
西周	14		陝西鳳翔彪角新庄河 (西周早期)	直徑 7.22 鈕長 0.8	橋形	圓形	《文物》1979年12期、《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1》
	15		陝西扶風白龍 (西周早期)	直徑 8.4	橋形	圓形	《考古與文物》1993年3期
	16		陝西岐山王家嘴 (西周早期)	直徑 8.7	橋形	圓形	《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1》
	17		陝西武功黃家河 (西周早期)	直徑 8.8	橋鈕或 橄欖形 鈕	圓形	《考古》1988年7期
	18		陝西長安澧西張家坡 (西周早期)	直徑 10.5	半環形	圓形	《澧西發掘報告》
	19		陝西咸陽崔家河東村 (西周早期)	直徑 9.5	橄欖形	圓形	《考古與文物》1984年4期
	20		陝西淳化史家 (西周早期)		橋形	圓形	《考古與文物》1980年2期
	21		甘肅崇信于家灣M38 (西周早期)	直徑 8.5 厚 0.15	橄欖形	圓形	《崇信于家灣周墓》




時代	序號	圖	出土地點	尺寸(公分)	鈕式	形制	資料來源
西周	22		甘肅崇信于家灣 M38 (西周早期)	直徑 8 厚 0.2	覆斗形	圓形	《崇信于家灣周墓》
	23	素面無紋	河北滿城要莊	直徑 5.4			《文物春秋》
	24		河南浚縣辛村 M42 (西周早期)	直徑 10	橄欖形	圓形	梅原末治 1968
	25		湖北黃陂魯台山 M31:5 (西周早期)	直徑 14 厚 0.3		圓形	《江漢考古》 1982年2期
春秋	26		河南三門峽上村 嶺 M1612:65 (春秋早期)	直徑 6.7 厚 0.35 雙鈕長 2.1	橋形 (雙鈕)	圓形	《上村嶺虢國墓地》
	27		河南三門峽上村 嶺 M1650:1-1 (春秋早期)	直徑 5.9 厚 0.2	橋形	圓形	梅原末治 1968

時代	序號	圖	出土地點	尺寸(公分)	鈕式	形制	資料來源
春秋	28		河南三門峽上村嶺 M1650:1-2 (春秋早期)	直徑 6.4 厚 0.25	橋形	圓形	梅原末治 1968
	29		陝西鳳翔秦公 1 號大墓 (春秋中期)		橋形	圓形	宋遠茹 2015
	30		山西新絳東柳泉 (春秋晚期)		獸形	圓形	楊建華 2004
	31		山西原平劉莊塔崗梁 (春戰之交)	直徑 7.5	橋形	圓形	《文物季刊》 1988 年 1 期
	32		山西長治分水嶺 M53:8 (戰國早期)	直徑 8.2 厚 0.2	橋形	圓形	《考古》1964 年 3 期
	33		山西長治分水嶺 M41:24 (戰國)	邊長 7 厚 0.2	橋形	方形	《考古》1964 年 3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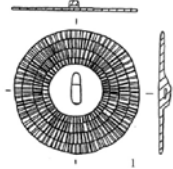


時代	序號	圖	出土地點	尺寸(公分)	鈕式	形制	資料來源
春秋	34		陝西鳳翔南指揮 (戰國早期)	直徑 10 厚 0.2	橋形	圓形	《考古與文物》1991 年 2 期
	35		寧夏中寧倪丁村 M2:9 (戰國早期)	直徑 7.4 厚小於 0.1	無	圓形	《考古》1987 年 9 期、楊建華 2004
	36	素面無紋	山東臨淄郎家莊 (春秋晚期—戰國早期)	直徑 9.2			《考古學報》1977 年 1 期
	37	素面無紋	湖南長沙龍洞坡 M826 (春秋晚期)	直徑 8.8			《文物參考資料》1954 年 10 期
	38		湖南長沙烈士公園 M6 (春秋晚期)	直徑 9	橋形		《文物》1991 年 5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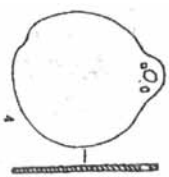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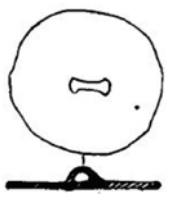

附錄二 中原地區凹面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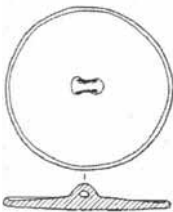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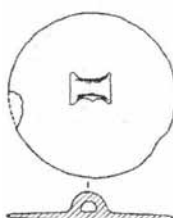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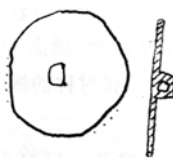
時代	圖	出土地點	尺寸(公分)	鈕式	形制	資料來源
西周 早期		北京昌平白浮	直徑 9.9 直徑 9.5		圓形	《考古》1976 年 4 期
西周 早期		陝西扶風黃堆	直徑 8.8	橄欖形	圓形	《光明日報》 1995 年 10 月 13 日
西周 中期		陝西張家坡 M170:61	直徑 7.2	橋形	圓形	《張家坡西周 墓地》
西周		陝西張家坡 M303:8	直徑 7.1	橋形	圓形	《張家坡西周 墓地》
西周 中晚期	 	陝西扶風王大川 村北土壕	直徑 8	橋形	圓形	《考古與文 物》1980 年 4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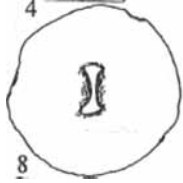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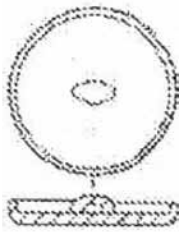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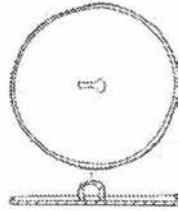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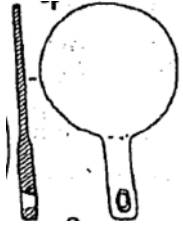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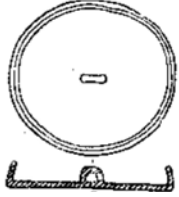
時代	圖	出土地點	尺寸(公分)	鈕式	形制	資料來源
春秋 早期		河南三門峽上 村嶺虢國墓地 M1052 : 56	直徑 7.5	橋形	圓形	《上村嶺虢國 墓地》
春秋		浙江紹興 M306 : 19	直徑 3.6	橋形	圓形	《文物》1984 年 1 期
		遼寧水泉城子 7701 : 7	直徑 10.8	橋鈕	圓形	《考古》1983 年 8 期

附錄三 北方地帶及鄰近地區銅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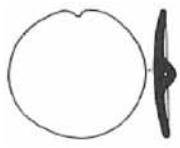

地點	序號	圖	出土地點	尺寸 (公分)	鈕式	形制	資料來源
新疆	1		哈密天山北路墓地 (第三期)		橋形	圓形	呂恩國、常喜恩、王炳華 2001
	2		哈密天山北路墓地 (第四期)		橋形	圓形	呂恩國、常喜恩、王炳華 2001 李水城 2009
	3		哈密天山北路墓地 (第四期)		橋形	圓形	高西省 2015
	4		哈密天山北路墓地		橋形	圓形	劉學堂 2016
	5		巴里坤南灣 (約天山北路墓地第三四期)	直徑 9.5	弓形	圓形	《新疆文物》 1993 年 1 期；呂恩國、常喜恩、王炳華 2001
	6		巴里坤南灣 (約天山北路墓地第三四期)	直徑 8	弓形	圓形	《新疆文物》 1993 年 1 期；呂恩國、常喜恩、王炳華 2001
	7		巴里坤南灣 (約天山北路墓地第三四期)	直徑 10.6	弓形	圓形	《新疆文物》 1993 年 1 期；呂恩國、常喜恩、王炳華 2001
	8		哈密五堡水庫墓地 焉不拉克早期(天山北路三四期)				呂恩國、常喜恩、王炳華 2001
	9	帶柄鏡		哈密五堡 碳十四 1000 BCE	長 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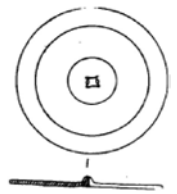


地點	序號	圖	出土地點	尺寸 (公分)	鈕式	形制	資料來源
新疆	10		新源縣則克台鎮 西部北山坡草場 (青銅時代)	直徑 10.6 厚 0.2		圓形	《伊犁草原文化——尋找游牧人的歷史軌跡》
	11		新源縣則克台鎮 西部北山坡草場 (青銅時代)	直徑 9.3 厚 0.2		圓形	《伊犁草原文化——尋找游牧人的歷史軌跡》
	12		新源縣別斯托別 墓地 (相當於西漢)	直徑 14.2 厚 0.1		圓形	《考古》2012 年 9 期
	13		新源縣鞏乃斯種 羊場石關墓 (相當於西漢)	直徑 7.5 厚 0.2			《考古與文物》 1985 年 2 期、 《新疆文物考古 新收穫(1979- 1989)》
	14		哈密焉不拉克 (早期鐵器時代， 第一期，相當於 商末到西周早中 期)	直徑 6.7 厚 0.2	橋形	圓形	《考古學報》 1989 年 3 期、 《新疆文物考古 新收穫(1979- 1989)》
	15		哈密焉不拉克 (早期鐵器時代， 第二期，相當於 西周晚期春秋早 期)	直徑 4.5 厚 0.1	矩形	圓形	《考古學報》 1989 年 3 期、 《新疆文物考古 新收穫(1979- 1989)》
	16		哈密焉不拉克 (早期鐵器時代)				《考古學報》 1989 年 3 期、 《新疆文物考古 新收穫(1979- 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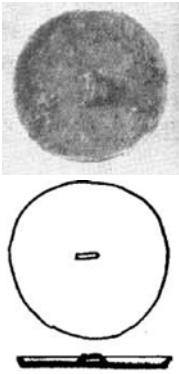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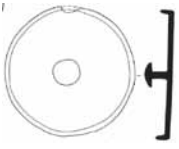

地點	序號	圖	出土地點	尺寸 (公分)	鈕式	形制	資料來源
新疆	17		哈密焉不拉克 (早期鐵器時代)				《考古學報》 1989年3期、 《新疆文物考古 新收穫(1979- 1989)》
	18		哈密焉不拉克	直徑 6.1			《新疆文物》 1993年1期
	19		哈密焉不拉克	直徑 5.7			《新疆文物》 1993年1期
	20		哈密焉不拉克	直徑 7.8			《新疆文物》 1993年1期
	21		特克斯縣闊克蘇 西 (青銅時代—早 期鐵器時代)	直徑 9.3 厚 0.5	橋形	圓形	《考古》2012 年9期
	22		特克斯縣闊克蘇 西 (青銅時代—早 期鐵器時代)	直徑 8.2 厚 0.2	橋形	圓形	《考古》2012 年9期
	23		和靜察吾呼溝	直徑 8.5	橋形	圓形	《新疆文物》 1993年1期
	24		和靜察吾呼溝 4 號墓地 M105 (察吾呼文化第 一期)	直徑 9 厚 0.3	橋形	圓形	呂恩國、常喜恩 王炳華 2001
25		和靜察吾呼溝	直徑 8 厚 0.2	橋形	圓形	《新疆文物》 1988年4期、 《新疆文物考古 新收穫(1979- 1989)》	

地點	序號	圖	出土地點	尺寸 (公分)	鈕式	形制	資料來源
新疆	26		和靜縣巴侖台鎮 哈布其罕墓地 (察吾呼文化第一期)	I號墓	橋形	圓形	呂恩國、常喜恩、王炳華 2001
	27		拜城縣克孜爾墓地 (約察吾呼文化第三期)				呂恩國、常喜恩、王炳華 2001
	28		塔城白楊河 (相當於戰國、西漢)	直徑 8.7 厚 0.8	橋形	圓形	《考古》2012年 9 期
	29		塔城白楊河 (相當於戰國、西漢)	直徑 15.3 厚 0.3	橋形	圓形	《考古》2012年 9 期
	30		塔城白楊河 (相當於戰國、西漢)	直徑 5.5 厚 0.3		圓形	《考古》2012年 9 期
	31		輪台群巴克墓地 察吾呼文化群巴克類型 (察吾呼文化第四期)			柄式	呂恩國、常喜恩、王炳華 2001
	32		輪台群巴克 (相當於戰國、西漢)	徑 15 厚 0.2	橋形	圓形	《考古》1987年 11 期、《新疆文物考古新收穫(1979-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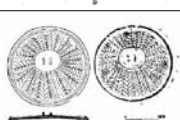
地點	序號	圖	出土地點	尺寸 (公分)	鈕式	形制	資料來源
新疆	33	平素無紋	阿勒泰縣克爾木齊	徑 6	橋形	圓形	《文物》1981年1期、《新疆文物考古新收穫(1979-1989)》
	34		阿勒泰地區富蘊縣薩烏達戈爾墓地	徑 5.5 長 9		柄式	《新疆阿勒泰地區考古與歷史文集》
	35		阿勒泰地區哈巴河縣哈拜汗墓地	徑 9	橋形	圓形	《新疆阿勒泰地區考古與歷史文集》
青海	36		貴南尕馬台 (齊家文化)	直徑 8.9 厚 0.4	橋形	圓形	《考古學報》1981年3期、《考古》1980年4期；高西省2015
	37		大通		橋形	圓形	《青海文物》1996年10期、喬虹2011
	38		湟中前營村	直徑 6 厚 0.12	橋形	圓形	《文物》1992年2期
	39		湟中前營村	直徑 5.5 厚 0.12	橋形	圓形	《文物》1992年2期

地點	序號	圖	出土地點	尺寸 (公分)	鈕式	形制	資料來源
青海	40		湟源大華中莊 (卡約文化晚期)	直徑 10.5	橋形	圓形	《考古與文物》 1985 年 5 期、 大華中莊共出土 類似鏡 34 面， 一墓一般出 1-2 面，有的出 6-9 面
	41		湟源大華中莊 (卡約文化晚期)	直徑 9	橋形	圓形	《考古與文物》 1985 年 5 期
甘肅	42		廣河齊家坪 (齊家文化)	直徑 6	橋形	圓形	《文物考古工作 三十年》、《史 前研究》1984 年 1 期；高西省 2015
	43		玉門火燒溝 (四壩文化)	直徑 5-6		圓形	高西省 2015
	44		酒泉干骨崖 (四壩文化)		橋形	圓形	李水城 2009
	45		傳甘肅臨夏	直徑 14.6	橋形	圓形	《中國文物報》 1993 年 3 月 31 日、《中國青 銅全集·16·銅 鏡》

地點	序號	圖	出土地點	尺寸 (公分)	鈕式	形制	資料來源
甘肅	46		平涼	直徑 6.8 厚 0.1-0.2	橋形	圓形	《文物》1991年 5 期
	47		漳縣	直徑 6.5 厚 0.1	半環形 橋鈕		《文物》1994 年 11 期、《故宮文 物月刊》136 期
	48		民勤縣沙井村 (沙井文化)				李水城 2009
	49		天水放馬灘 M13:9 (相當於戰國晚期)	直徑 7.3 厚 0.2	橋形	圓形	《文物》1989 年 2 期
出土地不明	50		出土地不明·安特生 1936-1938 購於北京 現藏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直徑 7.4	橋形	圓形	<i>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ulletin, No. 77</i>
內蒙古	51		傳出鄂爾多斯內蒙古張北縣(今河北張北) 現藏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直徑約 6.9	橋形	圓形	Andersson 1932 <i>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ulletin, No. 77</i>

地點	序號	圖	出土地點	尺寸 (公分)	鈕式	形制	資料來源
內蒙古	52		傳出戈壁沙漠 現藏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直徑 6.5	橋形	圓形	<i>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ulletin No. 77</i>
	53		鄂爾多斯	直徑 6.2	橋形	圓形	《鄂爾多斯式青 銅器》
	54		鄂爾多斯	直徑 6.3	橋形	圓形	《鄂爾多斯式青 銅器》
	55		鄂爾多斯	直徑 6.1	橋形	圓形	《鄂爾多斯式青 銅器》
	56		鄂爾多斯	直徑 5	橋形	圓形	《鄂爾多斯式青 銅器》
	57		鄂爾多斯	直徑 8	無鈕		《鄂爾多斯式青 銅器》、《文物》 1980 年 7 期
	58		寧城南山根 (夏家店上層)	三件直徑 6.6、8.4、 7.25	橋形	圓形	《考古》1985 年 7 期
	59		寧城南山根 M102 (夏家店上層)	直徑 7.8	橋形	圓形	《考古》1981 年 4 期
	60		小黑石溝 92NDXAIIM5:2 (夏家店上層)	直徑 8.5	蘑菇鈕	圓形	《小黑石溝—— 夏家店上層文化 遺址發掘報告》
61		依克昭盟西溝畔 M2:73	直徑 8	無	圓形	《文物》1980 年 7 期	

地點	序號	圖	出土地點	尺寸 (公分)	鈕式	形制	資料來源
寧夏	62		中寧倪丁村 M2:24	直徑 3.5 厚小於 0.1	橋形	圓形	《考古》1987 年 9 期
陝西	63		淳化官莊鄉趙家莊	直徑 5.5	橋形	圓形	《考古與文物》 1986 年 5 期
河北	64	與婦好墓所出同心圓鏡同。製作粗疏。	青龍	直徑 6			《中國青銅器全集·16·銅鏡》
	65		灤南後遷義 99M5:6 (相當於商代晚期)	直徑 10.2 厚 0.6			《文物春秋》 2017 年 2 期
	66		灤南後遷義 99M5:7 (相當於商代晚期)	直徑 9.6 厚 0.4			《文物春秋》 2017 年 2 期
	67	帶柄素鏡	平山訪駕村北 M8004	直徑 4.8 柄長 2.2			《考古學集刊》 5
遼寧	68		喀左道虎溝 (相當於商末周初)	直徑 6.1 厚 0.15	橋形	圓形	《考古學文化論集 2》、《考古學文化論集 1》

地點	序號	圖	出土地點	尺寸 (公分)	鈕式	形制	資料來源
遼寧	69		本溪劉家哨	直徑 17.8	雙橋形鈕	圓形	《考古》1992年4期
	70		十二台營子 M1	直徑	四橋形背鈕	圓形	《考古學報》1960年1期
	71		十二台營子 M2 (二件)	直徑 20-20.1 厚 0.2-0.3	四橋形背鈕	圓形	《考古學報》1960年1期
	72		十二台營子 M3 (相當於春戰之交)	直徑 22.5 厚 0.8	三橋形鈕	圓形	《考古學報》1960年1期
	73		本溪明山區高台子鄉梁家村 (相當於春秋晚期)	直徑 12.8	雙橋形鈕	圓形	《考古》1987年2期
	74		鄭家洼子 (相當於春秋晚期)	直徑 8.8 厚 1	雙橋形鈕	圓形	《考古學報》1975年1期
	75		丹東寬甸縣趙家堡 (相當於戰國中晚期)	直徑 12.3 厚 0.4	雙橋形鈕	圓形	《考古》1984年8期、《考古》1986年2期

地點	序號	圖	出土地點	尺寸 (公分)	鈕式	形制	資料來源
遼寧	76		丹東寬甸縣趙家堡 (相當於戰國中晚期)	直徑 14.5 厚 0.3	雙橋 形鈕	圓形	《考古》1984 年 8 期
	77		丹東寬甸縣趙家堡 (相當於戰國中晚期)	直徑 12 厚 0.2	雙橋 形鈕	圓形	《考古》1984 年 8 期
吉林	78		吉安五道溝門積 石墓 (相當於戰國中 晚期)	直徑 13.9 厚 0.2 鏡緣寬 1	雙橋 形鈕	圓形	《考古》1981 年 6 期、《考古》 1986 年 2 期
	79		吉林樺甸西荒山屯 (相當於戰國中 期)		雙橋 形鈕	圓形	《考古》1986 年 2 期

地點	序號	圖	出土地點	尺寸 (公分)	鈕式	形制	資料來源
韓國	80		朝鮮半島 (鐵器時代)		雙橋 形鈕	圓形	<i>Eurasia Antiqua</i> , Band 6, p. 475, 《韓國考古學概 論》
俄濱海地區邁黑河鴿崗	81		俄濱海地區邁黑 河鴿崗		雙橋 形鈕	圓形	《考古》1986 年2期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宋)王黼編纂，《重修宣和博古圖》，揚州：廣陵書社，2010。
 (清)梁思正撰，《西清古鑑》，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2。

近代論著

- A. A. 提什金、H. H. 謝列金，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譯，《金屬鏡：阿爾泰古代和中世紀的資料》，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E. H. 切爾內赫、C. B. 庫茲明內赫，王博、李明華譯，《歐亞大陸北部的古代冶金：塞伊瑪—圖爾賓諾現象》，北京：中華書局，2010。
 中國青銅器全集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6·銅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長治分水嶺戰國墓第二次發掘〉，《考古》，1964年3期，頁111-13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鑄銅遺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
 山東省博物館，〈臨淄郎家莊一號東周殉人墓〉，《考古學報》，1977年1期，頁73-104。
 文物編輯委員會，《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王光永、曹明檀，〈寶雞市郊區和鳳翔發現西周早期銅鏡等文物〉，《文物》，1979年12期，頁90-91。
 王趁意，〈中國早期青銅鏡紋飾之謎〉，《收藏家》，2004年10期，頁33-38。
 王煜，〈殷墟婦好墓出土銅鏡寓意試探〉，《中原文物》，2014年2期，頁57-59。
 王煜，〈象天法地：先秦至漢晉銅鏡圖像寓意概說〉，《南方文物》，2017年1期，頁188-202。
 王綱懷、陳燦堂，〈中國陽燧技術研究〉，收入王綱懷編，《中國早期銅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40-51。
 孔祥星、劉一曼，《中國古銅鏡》，臺北：藝術圖書公司，199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張家坡西周墓地》，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商代墓地》，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東北工作隊，〈內蒙古寧城縣南山根102號石槨墓〉，《考古》，1981年4期，頁304-308、39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新疆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新疆輪台群巴克墓葬第一次發掘簡報〉，《考古》，1987年11期，頁987-996。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武功發掘隊，〈1982-1983年陝西武功黃家河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8年7期，頁601-615。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1986年安陽大司空村南地的兩座殷墓〉，《考古》，1989年7期，頁591-600。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嶺虢國墓地》，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澧西發掘報告：1955-1957年陝西長安縣澧西相考古發掘資料》，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 正定縣文物保管所，〈河北靈壽縣西木佛村出土一批商代文物〉，《文物資料叢刊》，5卷，1981，頁117-119。
- 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地區的又一重要考古收獲—昌平白浮西周木槨墓的新啟示〉，《考古》，1976年4期，頁246-258。
- 白云翔，〈漢式銅鏡在中亞的發現及其認識〉，《文物》，2010年1期，頁78-86。
- 白云翔，〈試論東亞古代銅鏡鑄造技術的兩個傳統〉，《考古》，2010年2期，頁63-77。
- 田建、何雙全，〈甘肅天水放馬灘戰國秦漢墓群的發掘〉，《文物》，1989年2期，頁1-11。
- 田廣金、郭素新，〈西溝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7期，頁1-10。
- 田廣金、郭素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 左駿、李荔，〈“弓型器”用途與來源再考〉，《華夏考古》，2009年1期，頁125-128。
-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小黑石溝——夏家店上層文化遺址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崇信于家灣周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 水濤，〈新疆青銅時代諸文化的比較研究——附論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進程〉，收入氏著，《中國西北地區青銅時代考古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頁6-46。
- 朱貴，〈遼寧朝陽十二臺營子青銅短劍墓〉，《考古學報》，1960年1期，頁63-71、130-135。
- 安志敏，〈中國早期銅器的幾個問題〉，《考古學報》，1981年3期，頁269-285。
- 任曉燕，〈論尕馬台墓地文化屬性及相關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訊》，29期，2016，頁34-35。
- 巫鴻，《黃泉下的美術：宏觀中國古代墓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 呂恩國、常喜恩、王炳華，〈新疆青銅時代考古文化淺論〉，收入宿白編，《蘇秉琦與當代中國考古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頁179-184。
- 何堂坤，〈寧城早期銅鏡及其科學分析〉，《考古》，1985年7期，頁659-661、680。
- 何堂坤，〈銅鏡起源初探〉，《考古》，1988年2期，頁173-176。
- 杜正勝，〈歐亞草原動物文飾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 刊》，64本2分，1993年6月，頁231-408。
- 邵會秋，〈新疆地區安德羅諾沃文化相關遺存探析〉，《邊疆考古研究》，8輯，2009年12月，頁81-97。
- 忻州地區文物管理處原平市博物館，〈山西原平劉莊塔崗梁東周墓第二次清理簡報〉，《文物季刊》，1998年1期，頁4-14。
- 宋新潮，〈中國早期銅鏡及其相關問題〉，《考古學報》，1997年2期，頁147-169。
- 宋遠茹，〈秦鏡と秦人の“破鏡”習俗について〉，東京：東京国立博物館特別展「始皇帝と大兵馬俑」開催記念国際シンポジウム「秦王朝と兵馬俑—発掘された歴史の実像—」，2015年12月19日，頁12-17。
- 李水城，〈沙井文化研究〉，收入氏著，《東風西漸：中國西北史前文化之進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128-153。
- 李水城，〈西北與中原早期冶銅業的區域特徵及交互作用〉，收入氏著，《東風西漸：中國西北史前文化之進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246-293。
- 李亨求，〈銅鏡的源流——中國青銅文化與西伯利亞青銅文化的比較研究〉，《故宮學術季刊》，1卷4期，1984年夏季，頁29-70。
- 李亨求，〈銅鏡的源流——再論韓國青銅文化的起源〉，《故宮學術季刊》，3卷2期，1985年冬季，頁45-82。
- 李永迪，〈殷墟出土器物選粹〉，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9。
- 李虎侯，〈齊家文化銅鏡的非破壞鑑定——快中子放射化分析法〉，《考古》，1980年4期，頁365-368。
- 李零，〈跋中山王墓出土的六博棋局——與尹灣《博局占》的設計比較〉，收入氏著，《入山與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177-200。
- 李零，〈說漢陽陵“羅經石”遺址的建築設計〉，收入氏著，《入山與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177-200。
- 李漢才，〈青海湟中縣發現古代雙馬銅鉞和銅鏡〉，《文物》，1992年2期，頁16。
- 李學勤，〈中國銅鏡的起源及傳播〉，收入氏著，《比較考古學隨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57-63。
- 李學勤，〈續論中國銅鏡的傳播〉，收入氏著，《比較考古學隨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64-70。
- 吳曉筠，〈馬車在早期東西交流中的地位與交流模式：西元前2000-1200年〉，《故宮學術季刊》，28卷4期，2011年夏季，頁95-132。
- 吳曉筠，〈再思武丁時代〉，收入蔡玫芬、朱乃誠、陳光祖編，《商王武丁與后婦好——殷商盛世文化藝術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頁332-343。
- 吳曉筠，〈皇帝的鏡子——清宮鏡鑑文化與典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4。

-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湟中下西河潘家梁卡約文化墓地〉，《考古學集刊》，8輯，1994年12月，頁28-86。
-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貴南尕馬台》，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
- 青海省湟源縣博物館、青海省文物考古隊、青海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青海湟源縣大華中莊卡約文化墓地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5年5期，頁11-34。
- 林巴奈夫，楊美莉譯，《中國古玉研究》，臺北：藝術圖書公司，1997。
- 林沅，〈商文化青銅器與北方地區青銅器關係之再研究〉，收入氏著，《林沅學術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頁262-288。
- 林沅，〈青銅掛韁鉤補說〉，《邊疆考古研究》，6輯，2007，頁103-109。
- 林梅村，〈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與史前絲綢之路〉，《文物》，2015年10期，頁49-63。
- 林梅村，〈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在中國〉，《考古與文物》，2016年2期，頁94-101。
- 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中國北方系青銅器》，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2005。
- 和正雅，〈從潘家梁墓地的發掘試談對卡約文化的認識〉，《青海考古學會會刊》，1981年3期。
- 岳慎禮，〈青銅鏡探源〉，《大陸雜誌》，17卷5期，1958年9月，頁16-17。
- 姚生民，〈陝西淳化出土的商周青銅器〉，《考古與文物》，1986年5期，頁12-22。
- 胡博（Louisa G. Fitzgerald-Huber），〈齊家與二里頭：遠距離文化互動的討論〉，收入夏含夷編，《遠方的時習——《古代中國》精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3-54。
- 郜向平，〈略論商周青銅弓型器的形制演變〉，《華夏考古》，2007年1期，頁94-101。
- 陝西省博物館，《陝西出土商周青銅器1》，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1984。
-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編，《陝北出土青銅器3》，成都：巴蜀書社，2009。
- 科技保護中心，《伊犁草原文化：尋找遊牧人的歷史軌跡》，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 哈密博物館，《哈密文物精粹》，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
- 建平縣文化館、朝陽地區博物館，〈遼寧建平縣的青銅時代墓葬及相關遺物〉，《考古》，1983年8期，頁679-694。
-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紹興306號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1期，頁10-26、97、99-103。
- 馬今洪，〈上海博物館藏銅鏡綜述〉，收入上海博物館編，《練形神冶 瑩質良工——上海博物館藏銅鏡精品》，上海：上海博物館，2005，頁10-28。
- 陳俊峰，〈甘肅漳縣發現的蟠蛇紋銅鏡〉，《文物》，1994年11期，頁91。

- 陳俊峰，〈雌雄蟠蛇紋銅鏡探討〉，《故宮文物月刊》，136期，1994年7月，頁134-135。
- 陳佩芬，〈中國青銅鏡發展概述〉，收入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6·銅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頁1-34。
- 陳耘，〈鏡奩梳篋各異工〉，《大觀》，2010年5期，2010年2月，頁2-8。
- 高阿申，〈甘肅平涼發現一件商代銅鏡〉，《文物》，1991年5期，頁96。
- 高去尋，〈殷代的一面銅鏡及其相關之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9本下冊，1958年11月，頁658-719。
- 高去尋，〈刀斧葬中的銅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7本，1967年3月，頁355-381。
- 高去尋，〈西北岡出土的殷代弓形銅器〉，《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刊》，2期，1973年11月，頁1-10。
- 高西省，〈論早期銅鏡〉，《中原文物》，2001年3期，頁28-36。
- 高西省，〈中國早期銅鏡的發現與研究〉，收入王綱懷編，《中國早期銅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1-26。
- 高至喜，〈論楚鏡〉，《文物》，1991年5期，頁42-60。
- 烏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銅器〉，《考古學報》，1985年2期，頁135-156。
- 曹發展、景凡，〈陝西旬邑崔家河遺址調查記〉，《考古與文物》，1984年4期，頁3-8。
- 淳化縣文化館，〈陝西淳化史家原出土西周大鼎〉，《考古與文物》，1980年2期，頁17-20。
- 郭物，〈從石峁遺址的石人看龍山時代晚期中國北方同歐亞草原的交流〉，收入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早期絲綢之路暨早期秦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頁56-65。
- 郭寶鈞，《濬縣辛村》，北京：科學出版社，1964。
- 梅建軍、高濱秀，〈塞伊瑪—圖比諾現象和中國西北地區的早期青銅文化：兼評帕爾青格教授“塞伊瑪—圖比諾現象和西伯利亞動物紋飾的起源”一文〉，《新疆文物》，2003年1期，頁47-57。
- 梅建軍，〈關於新疆出土早期銅鏡研究的幾個問題〉，收入新疆吐魯番地區文物局編，《吐魯番研究——第二屆吐魯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頁246-251。
- 梁上椿，〈古鏡研究總論〉，《大陸雜誌》，5卷5期，1952年9月，頁9-13。
- 梁志龍，〈遼寧本溪劉家哨發現青銅短劍墓〉，《考古》，1992年4期，頁315-317。
- 梁雲，〈考古學上所見秦與西戎的關係〉，《西部考古》，2016年2期，頁112-146。
- 許玉林、王連春，〈丹東地區出土的青銅短劍〉，《考古》，1984年8期，頁708、712-714。
- 張天恩，〈略說陽燧—被考古發現所忽略的一類銅器〉，《中國文物報》，1997年7月27日。

- 張文瑞，〈灤縣後遷義遺址商代銅鏡探源〉，《文物春秋》，2017年2期，頁16-19。
- 張玉忠，〈新疆新源巩乃斯種羊場石棺墓〉，《考古與文物》，1985年2期，頁21-26。
- 張長壽、梁星彭，〈關中先周青銅文化的類型與周文化的淵源〉，《考古學報》，1989年1期，頁1-23。
- 張錫瑛，〈試論東北地區先秦銅鏡〉，《考古》，1986年2期，頁163-172。
- 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 程建，〈試論中國銅鏡的起源和早期映照方式〉，《東南文化》，1期，1992，頁88-92。
- 黃陂縣文化館、孝感地區博物館、湖北省博物館，〈湖北黃陂魯臺山兩周遺址與墓葬〉，《江漢考古》，1982年2期，頁37-61、115-119。
- 黃銘崇，〈畜牧者與農耕者之間——早期鄂爾多斯文化群與商文明〉，收入李永迪編，《“周邊”與“中心”：殷墟時期安陽及安陽以外地區的考古發現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頁23-98。
- 雍城考古隊、韓偉、吳鎮烽，〈鳳翔南指揮西村周墓的發掘〉，《考古與文物》，1982年4期，頁15-38。
-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新收獲（1979-1989）》，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特克斯縣閻克蘇西2號墓群的發掘〉，《考古》，2012年9期，頁3-16、97-101。
-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阿勒泰地區考古與歷史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 新疆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克爾木齊墓群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1期，頁23-32。
-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化廳文物處、新疆大學歷史系文博幹部專修班，〈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考古學報》，1989年3期，頁325-362、395-402。
- 楊軍昌，〈陝西周原出土西周時期的陽燧——兼論其科學研究價值〉，《故宮文物月刊》，165期，1996年12月，頁132-135。
- 楊軍昌，〈周原出土西周陽燧的技術研究〉，《文物》，1997年7期，頁85-87。
- 楊軍昌、段豔麗，〈中國早期陽燧的幾個問題〉，《東南文化》，2000年8期，頁101-103。
- 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考古隊，〈寧夏中寧縣青銅短劍墓清理簡報〉，《考古》，1987年9期，頁773-777。
- 蔡玫芬、蔡慶良編，《赫赫宗周——西周文化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
- 劉國瑞，《哈密古代文明》，烏魯木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7。
- 劉錚，〈甘青地區史前太陽神信仰初探〉，蘭州：西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
- 劉學堂，〈論中國早期銅鏡源於西域〉，《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3

- 期，頁 112-119。
- 劉學堂，〈中國早期銅鏡起源研究——中國早期銅鏡源於西域說〉，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新疆石器時代與青銅時代》，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頁 218-242。
- 劉學堂，《彩陶與青銅器的對話》，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
- 魏海波，〈遼寧本溪發現青銅短劍墓〉，《考古》，1987 年 2 期，頁 181-182。
- 韓金秋，《夏商西周中原的北方系青銅器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戴書田，〈河北滿城要莊發掘簡報〉，《文物春秋》，1992 年 S1 期，頁 251-266。
- 謝高文、張永超、趙旭陽，〈陝西旬邑下魏洛西周早期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 年 8 期，頁 19-34。
- 瀋陽故宮博物院、瀋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瀋陽鄭家洼子的兩座青銅時代墓葬〉，《考古學報》，1975 年 1 期，頁 141-156。
- 羅西章，〈扶風出土的商周青銅器〉，《考古與文物》，1980 年 4 期，頁 6-22、53。
- 羅西章，《北呂周人墓地》，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
- 羅芳賢，〈古代的取火用具——陽燧〉，《中國文物報》，1996 年 12 月 29 日。
- 嚴文明，〈論中國的銅石並用時代〉，《史前研究》，1984 年 1 期，頁 36-44。
- 顧鐵符，〈長沙 52、826 號墓在考古學上諸問題〉，《文物參考資料》，1954 年 10 期，頁 68-70。
- 甲元真之，〈中国青銅鏡の起源と東北アジアへの展開〉，收入西本豊弘、春成秀爾編，《東アジア青銅器の系譜》，東京：雄山閣，2008，頁 76-89。
- 江上波夫，〈綏遠地方出土古銅鏡の二三に就きて〉，《考古學雜誌》，26 卷 7 号，1936 年 7 月，頁 395-404。
- 梅原未治，《漢以前の古鏡の研究》，京都：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5。
- 梅原未治，〈周代の古鏡〉，《東方學》，35 輯，1968，頁 1-11。
- 金元龍，《韓國考古學概說》，서울特別市：一志社，1978。
- Anthony, David.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Andersson, Johan Gunnar. "Hunting Magic in the Animal Styl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4 (1932): 221-317.
- Andersson, Johan Gunnar. "Selected Ordos Bronze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5 (1933): 143-154.
- Aruz, Joan et al..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the State Hermitage, Saint Petersburg, and the Archaeological Museum, Ufa*.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0.

- Bagley, Robert W. "Shang Archaeolog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edited by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124-23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Bokovenko, Nikolay. "The Emergence of the Tagar Culture." *Antiquity* 80.310 (2006): 874-875.
- Brosseder, Ursula B.. "A Study on the Complexity and Dynamics of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in Late Iron Age Eurasia." In *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 along the Eurasian Steppe Zon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edited by Jan Bemmann, and Michael Schmauder, 246-249. Bonn: Universität Bonn Inst. f. Vor- u. Frühgeschichtliche Archäologie, 2015.
- Bulling, A.. "The decoration of some mirrors of the Chou and Han periods." *Artibus Asiae* 18.1 (1955): 20-45.
- Cugunov, Konstantin v., Parzinger, Hermann, and Nagler, Anatoli. *Der skythenzeitliche Fürstengurgan Aržan 2 in Tuva (Archäologie in Eurasien)*. Mainz am Rhein: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2010.
- Fitzgerald-Huber, Louisa G.. "Qijia and Erlitou: 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s." *Early China* 20 (1995): 17-67.
- Jianjun, Mei, and Shell, Colin. "The Existence of Andronovo Cultural Influence in Xinjiang during the 2nd Millennium B.C.." *Antiquity* 73.281 (1999): 570-578.
- Jianjun, Mei. *Copper and Bronze Metallurgy in Late Prehistoric Xinjiang: Its Cultural Context and Relationship with Neighbouring Regions*,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865. Oxford: Archaeopress, 2000.
- Kohl, Philip L.. *The Making of Bronze Age Eur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Kuzmina, Elena E.. "Cultural Connections of the Tarim Basin People and Pastoralists of Asian Steppes in the Bronze Age." In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vol. 2, edited by Victor H. Mair, 63-69.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1998.
- Kuzmina, Elena E..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oston: Brill, 2007.
- Kuzmina, Elena E.. *The Prehistory of the Silk Roa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 Li, Jaang. "Long-distance Interactions as Reflected in the Earliest Chinese Bronze Mirrors." In *The Lloyd Cotsen study Collection of Chinese Bronze Mirrors, Volume II: Studies*, edited by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34-49. Los Angeles: Cotsen Occasional Press, UCLA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Press, 2009-2011.
- Linduff, Kathryn M.. "Why have Siberian Artifacts been Excavated within Ancient Chinese Dynastic Borders?" In *Beyond the Steppe and the Sown*, edited by D. L. Person et al., 364-366.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6.

- Loubo-Lesnitchenko, E.. "Mirrors in the Minusunsk Basin." *Artibus Asiae* 35.1/2 (1973): 25-61.
- Mackenzie, Colin. "Mirrors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The Lloyd Cotsen Study Collection of Chinese Bronze Mirrors, Volume II: Studies*, edited by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63-70. Los Angeles: Cotsen Occasional Press, UCLA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Press, 2009-2011.
- Martin, F. R.. *L'Age du Bronze au Musée de Minoussinsk*. Stockholm: Samson & Wallin, 1893.
- Molodin, V. I., and Neskrov, A. V.. "Private Collection of Seima-turbino Bronzes from the Irtysh: The Tragedy of a Unique Site Destroyed by Unauthorized Excavations."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38/3 (2010): 58-71.
- Myrdal, Eva.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ulletin No. 77: Shang Period Bronzes*. Stockholm: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009.
- O'Donoghue, Diane M.. "Reflection and Reception: the Origins of the Mirror in Bronze Age China."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9.
- O'Donoghue, Diane M.. "Reflection and Reception: the Origins of the Mirror in Bronze Age China."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62 (1990): 5-184.
- Peng, Ke. "The Andronovo Bronze Artifacts Discovered in Gongliu County in Yili, Xinjiang." In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vol. 2, edited by Victor H. Mair, 573-580.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useum, 1998.
- Serikov, Y.B., Korochkova, O.N., Kuzminykh, S.V., and Stefanov, V.I.. "Shaitanskoye Ozero II: New Aspects of the Uralian Bronze Age."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37/2 (2009): 67-78.
- Sören, Stark, and Rubinson, Karen S.. *Nomads and Networks: The Ancient Art and Culture of Kazakhst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 Tiedeman, R. G.. *Reference Guide to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ies in China: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 Tseng, Lillian Lan-ying. "Representation and Appropriation: Rethinking the TLV Mirror in Han China." *Early China* 29 (2004): 163-215.
- Tseng, Lillian Lan-ying. "Positioning the Heavenly Horses on Han Mirrors." In *The Lloyd Cotsen Study Collection of Chinese Bronze Mirrors, Volume II: Studies*, edited by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88-99. Los Angeles: Cotsen Occasional Press, UCLA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Press, 2009-2011.
- von Eva, Kia-Wernard. "Bemerkungen zu einem nordostchinesisch-koreanischen Spiegel aus Ostsibirien." *Eurasia Antiqua* 6 (2000): 471-486.
- von Falkenhausen, Lothar. *The Lloyd Cotsen Study Collection of Chinese Bronze Mirrors, Volume I: Catalogue*. Los Angeles: Cotsen Occasional Press, UCLA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Press, 2009-2011.

- Институте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тепная полоса азиатской части СССР в Скифо-сарматское время. Серия. // *Археология СССР*. Том 12. -- Рыбаков Б.А. (ред.), 1992.
- Есин, Юрий. «Тайна богов древней степи». Абакан: Хакасский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языка,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тории, 2009.
- Есин Ю. Тайна богов древней степи. -- Абакан: Хакасский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языка,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тории, 2009.
- Кузнецова Т. М. Зеркала Скифии VI-III в. до н. э.. -- Москва: Индрик, 2002.
- Новгородова Э. А. Ножи карасук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из Монголии и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 *Монгольски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Н СССР, 1962.
- Тишкин А. А., Серегин Н. Н.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е зеркала из памятников эпохи бронзы Верхнего Приобья. // *Вестник То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 История vol. 22: 2, 2013 -- 116-119 с.

圖版出處

- 圖 1 遼寧瀋陽鄭家洼子墓地 M6512 及出土鏡類相關器物。圖版取自瀋陽故宮博物院、瀋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瀋陽鄭家洼子的兩座青銅時代墓葬〉，《考古學報》，1975 年 1 期，圖版 1、5、6。
- 圖 2 安德羅諾沃文化銅鏡。圖版取自 Kuzmina, Elena E.. *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 Leiden, the Netherlands*. Boston: Brill, 2007, fig. 33; A. A. 提什金、H. H. 謝列金，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譯，《金屬鏡：阿爾泰古代和中世紀的資料》，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 77。
- 圖 3 人面太陽紋鏡及奧庫涅夫文化柱石太陽神。圖版 3-1 取自劉學堂，《彩陶與青銅器的對話》，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頁 168；圖版 3-2 取自 Есин, Юрий. «Тайна богов древней степи». Абакан: Хакаский науч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языка,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тории, 2009, 107-110. 182 с.
- 圖 4 青海湟中下西河潘家梁遺址出土銅刀。圖版取自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湟中下西河潘家梁卡約文化墓地〉，《考古學集刊》，8 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 年 12 月，頁 59。
- 圖 5 尕馬台星紋鏡及相關器物及圖形。圖版 5-1 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6·銅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版 1；圖版 5-2 取自夏含夷編，《遠方的時習——《古代中國》精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40；圖版 5-3 取自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373；圖版 5-4 取自 Aruz, Joan et al.. *The Golden Deer of Eurasia: the State Hermitage, Saint Petersburg, and the Archaeological Museum, Ufa*.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0, 248。
- 圖 6 三角紋鏡及賽依瑪—圖爾賓諾相關器物。圖版 6-1 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6·銅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版 2；圖版 6-2 取自 Serikov, Y.B., Korochkova, O.N., Kuzminykh, S.V., and Stefanov, V.I.. “Shaitanskoye Ozero II: New Aspects of the Uralian Bronze Age.”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37/2 (2009): 73。
- 圖 7 婦好墓銅鏡。圖版 7-1、7-2 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6·銅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版 3、4；圖版 7-3 取自蔡玫芬、朱乃誠、陳光祖編，《商王武丁與后婦好——殷商盛世文化藝術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頁 60；圖版 7-4 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婦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彩版 12、圖版 68.5。
- 圖 8 北方地帶出土工具、兵器。圖版 8-1 ~ 8-5 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編，《陝北出土青銅器 3》，成都：巴蜀書社，2009，頁 428、394、465、468、520；圖版 8-6 取自正定縣文物保管所，〈河北靈壽縣西木佛村出土一批商代文物〉，《文物資料叢刊》，5 卷，1981，頁 118。

- 圖 9 安陽出土麟紋銅鏡及相關紋飾青銅器。圖版 9-1 取自李永迪，〈《殷墟出土器物選粹》〉，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9，頁 78；圖版 9-2 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殷墟花園莊東地商代墓地》〉，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頁 125、166。
- 圖 10 西周銅鏡與卡拉蘇克文化銅鏡。圖版 10-1 取自高西省，〈《中國早期銅鏡的發現與研究》〉，收入王綱懷編，〈《中國早期銅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 6；圖版 10-2 取自梅原未治，〈《周代の古鏡》〉，《東方學》，35 輯，1968，頁 6；圖版 10-3 作者攝於俄羅斯冬宮博物館；圖版 10-4 取自 *Новгородова Э. А. Ножи карасукского времени из Монголии и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 Монгольски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Н СССР, 1962, рис.44.*
- 圖 11 戰國時期青銅鏡範及鏡。圖版 11-1 取自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鑄銅遺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頁 175；圖版 11-2 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圖版 11-3 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6·銅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版 18。
- 圖 12 與東周同時期之歐亞草原東部流行鏡式。圖版 12-1、2 為作者攝於冬宮博物館；圖版 12-3 照片為作者攝於冬宮博物館，線圖取自 *Институте Археологии Степная полоса азиатской части СССР в Скифо-сарматское время. Серия. // Археология СССР. Том 12. -- Рыбаков Б.А. (ред.), 1992, 437 с.*
- 圖 13 戰國時期與同時期歐亞草原銅鏡。圖版 13-1 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6·銅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版 26；圖版 13-2 取自 Sören, Stark, and Rubinson, Karen S.. *Nomads and Networks: The Ancient Art and Culture of Kazakhst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78；圖版 13-3 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16·銅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圖版 13；圖版 13-4 取自 Cugunov, Konstantin v., Parzinger, Hermann, and Nagler, Anatoli. *Der skythenzeitliche Fürstengurgan Aržan 2 in Tuva (Archäologie in Eurasien)*. Mainz am Rhein: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2010, tafel 42.

The Emergence and Usage of Mirrors During the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Wu, Hsiao-yun
Department of Antiquitie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The earliest known bronze mirrors in the Central Plain of China were discovered at Yinxu (“Ruins of Yin”), referring to the last capital of the Shang dynasty in what is now Anyang, Henan Province. Though scholars have reached a consensus that these bronze mirrors were not made in Anyang and bear strong stylistic features related to steppe culture, the exact origin of these mirrors remains a contentious issue. However, an abundant amount of material has been recovered from excavations, and the resulting archaeological information and studies on Inner Asia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ocumented.

The present study begins by examining the archaeological context from the second to the first century BCE through related studies from the past and sifting the archaeological information to clarify the emergence, usage, and understanding of bronze mirrors in the Central Plain as well as the innovations introduced there. The present study proposes that bronze mirrors appeared in the Central Plain in the late Shang to early Zhou period via various routes and finally became an iconic item of Central Plain culture by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fter recognizing the traits and functions of Eurasian mirrors, they became the object of innovation in local crafts and were not brought from a particular area in Eurasia or following Shang or Western Zhou traditions.

Keywords: bronze mirror, Shang, Zhou, Tianshanbeilu cemetery, Qijia culture, Northern Zone, regional interaction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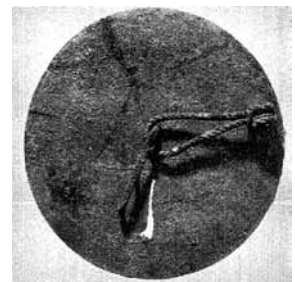
1. M6512



2. 雙鈕鏡



3. 鏡形飾



4. 馬頭上的圓形器

圖 1 遼寧瀋陽鄭家洼子墓地 M6512 及出土鏡類相關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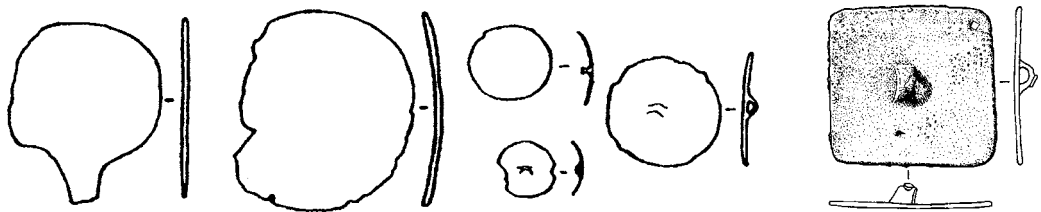


圖 2 安德羅諾沃文化銅鏡



1. 人面太陽紋鏡



2. 奧庫涅夫文化柱石太陽神

圖 3 人面太陽紋鏡及奧庫涅夫文化柱石太陽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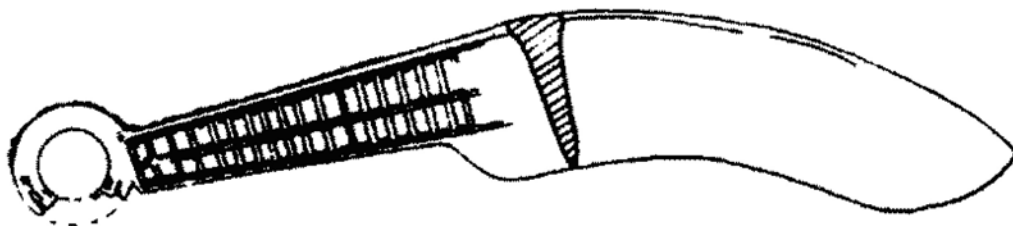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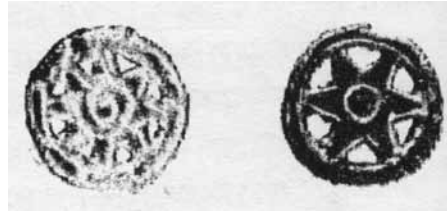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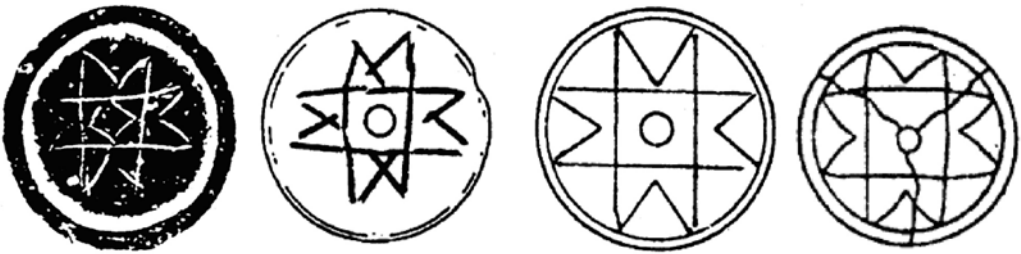
圖 4 青海湟中下西河潘家梁遺址出土銅刀



1. 尕馬台星紋鏡



2. BMAC 星紋封印



3. 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星紋圖像



4. 動物紋折沿鏡

圖 5 尕馬台星紋鏡及相關器物及圖形



1. 三角紋鏡



2. 賽依瑪—圖爾賓諾相關器物

圖 6 三角紋鏡及賽依瑪—圖爾賓諾相關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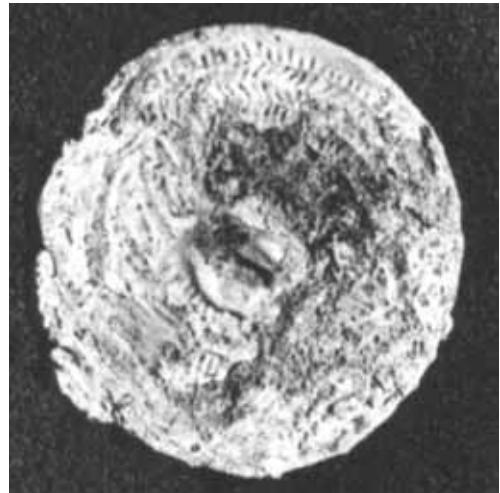
1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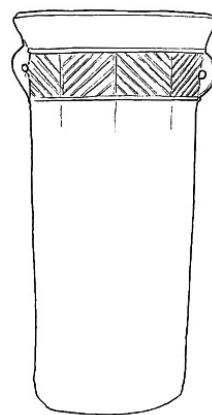
圖 7 婦好墓銅鏡



1. 鍬 陝西延川馬家河鄉
用斗村出土



2. 斧 陝西出土



3. 三鏟刀 陝西子長縣澗峪岔鄉出土



4. 環首刀 陝西綏德河底鄉溝口村出土



5. 環首刀 陝西延川馬家河鄉用斗村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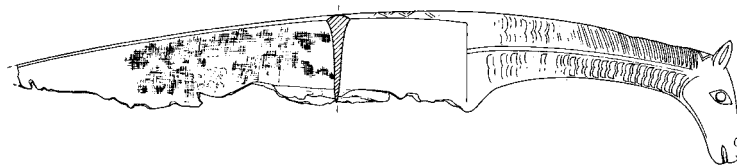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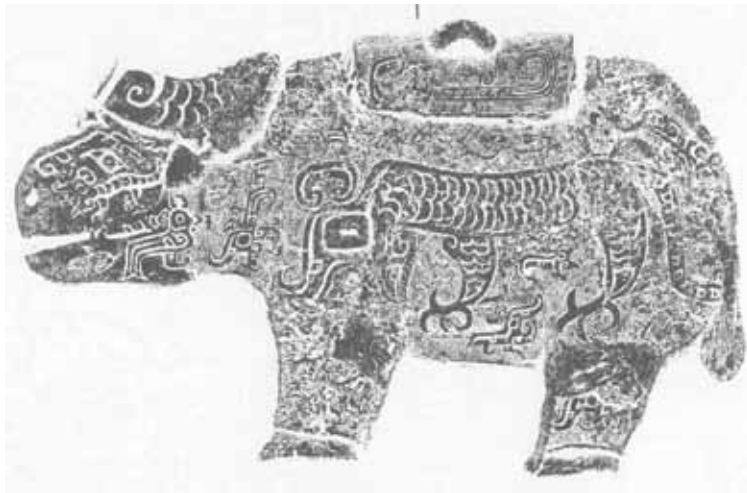


6. 環首刀 河北靈壽西木佛村出土的一件環首銅刀

圖 8 北方地帶出土工具、兵器



1. 麟紋銅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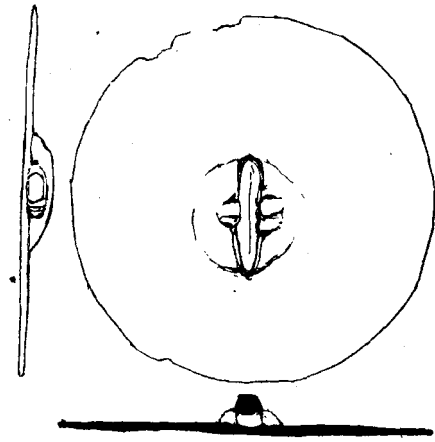


2. 動物造型上的麟紋

圖 9 安陽出土麟紋銅鏡及相關紋飾青銅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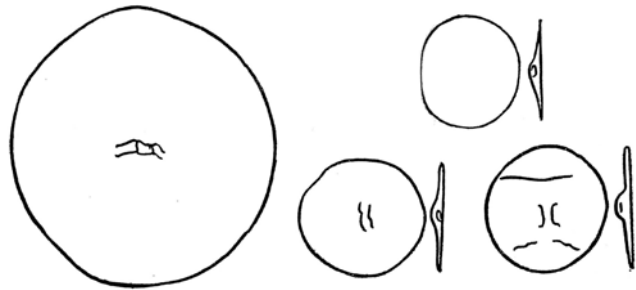
1. 西周銅鏡 陝西寶雞市郊區出土



2. 西周銅鏡 河南浚縣辛村 M42 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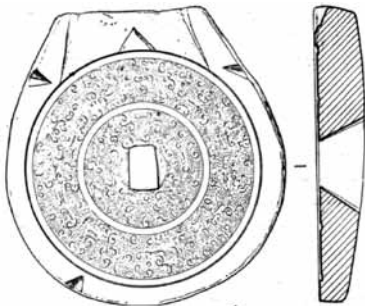


3. 卡拉蘇克文化銅鏡



4. 卡拉蘇克文化銅鏡

圖 10 西周銅鏡與卡拉蘇克文化銅鏡



1. 鏡範 山西侯馬鑄銅遺址出土



2. 戰國 磬折四夔紋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3. 雙層透雕鏡 河南洛陽西工區出土

圖 11 戰國時期青銅鏡範及鏡



1. 阿爾泰中部 西元前八到七世紀



2. 土瓦 西元前五到三世紀



3. 塔加爾文化 西元前七至三世紀

圖 12 與東周同時期之歐亞草原東部流行鏡式



1. 戰國晚期銅鏡 廣州南越王墓出土



2. 哈薩克斯坦採集銅鏡



3. 戰國晚期銅鏡 陝西西安郊區出土



4. 斯基泰阿爾贊2號墓銅鏡 哈薩克斯坦出土 西元前七世紀

圖 13 戰國時期與同時期歐亞草原銅鏡